

全球对话

14.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 Sari Hanafi 谈社会学

Thora Bjørke Sandberg
Helle Haglund

南南合作和种族化

Carolina Vestena
Eric Cezne
Marie Stiller
Roos Visser
Christine Hatzky
Sarah von Billerbeck
Kseniya Oksamytna

作为全球正义的 逆成长与后开发主义

Miriam Lang
Bengi Akbulut
Tatiana Roa Avendaño
Pablo Bertinat
Zo Randriamaro

开放行动

Ana Silvia Monzón
Carmen Gemita Oyarzo Vidal
Julián Rebón
Carlos de Jesús Gómez-Abarca

理论观点

Nadia Bou Ali
Ray Brassier

议题开讲

- > 劳资冲突的生态面向
- > 中东地区在数位层面的双重困境
- > 来自加萨学术界的公开信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4卷 / 第2期 / 2024.0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

GD



> 编辑的话

本期刊物终于完稿之时，加萨已是一片废墟。对此情况，我们没办法视而不见。这也是为什么，本期刊物的开头和结尾，都与加萨战争有关。这次的访谈专题，我们邀请到 ISA 前会长 Sari Hanafi 受访，访谈者为挪威社会学家 Thora Bjørke Sandberg 与 Helle Haglund。作为一名叙利亚籍巴勒斯坦人，于第二次起义（阿克萨起义）期间身在巴勒斯坦的 Hanafi，陈述了自己如何亲身经历了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计画。在这场访谈里，他也针对加萨地区的长久战争提出了反思，呼吁人们抵制以色列当局，并讨论了这场战争的常见解释及其缺失。

在本期刊物中，南南关系以及南北关系，分别是两个专题的核心。第一个专题是由 Carolina Vestena、Eric Cezne 和 Marie Stiller 筹组，其中，作者们透过阶级化、种族化的动态过程检视南南合作。这些文章尝试跳脱对称合作 (symmetrical cooperation) 与相互帮助 (mutual help) 的概念，并以南南合作背后的结构性支配为焦点，借此理解全球合作以及其挑战的关键；例如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南南合作经验，如何展现出其人际／制度性的种族化形式。

另一个专题，则以全球北方的去增长，与全球南方的后开发主义替代方案间产生协同作用的可能性为主题。本专题中的文章，分别探讨了全球不对等、南北关系、反绿色增长的反殖民全球联盟、「正义生态—社会转型」理论框架的必要性、建立基层能源转型的不同路径，以及以替代资本主义、捍卫生命为核心的反殖民气候正义运动……等议题。

《南方生态社会契约》与其全球南方、北方盟友带出的深入讨论——正如《[The Geopolitics of Green Colonialism: Global Justice and Ecosocial Transitions](#)》一书所提及——也启发了本专题的筹组。

本期的开放运动专题，概述了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抗议活动，以及社会运动在当代政治进程中的

作用。Ana Silvia Monzón 研究了瓜地马拉的原住民和民众抗议，如何成为现任进步总统、社会学家 Bernardo Arévalo 当选的关键因素；Carmen Gemita Oyarzo 讨论了随着智利制宪进程而生的改革期望、其失败的原因，以及随后出现的社运重构。此外，Julián Rebón 分析了 Milei 上任一百天内抗争运动的开端；Jesús Gómez-Abarca 则借由 Ayotzinapa 事件中失踪的43名学生，总结了墨西哥十年来的有罪不罚现象。

在理论专题中，Nadia Bou Ali 和 Ray Brassier 阐述了「过剩人口」(surplus population) 的概念，并以此描述失业的大量人口。这篇原创文章，是与 Alameda 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发表。

最后，在本期的「议题开讲」中，Simon Schaupp 讨论了劳资冲突如何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带来启示；卡达社会学家 Mohamed Zayani 和 Joe F. Khalil 则介绍了中东数位转型的主要趋势与影响。最后一篇文章，则是由158名巴勒斯坦学者和加萨各大学的教职员共同署名，试图向世界呼吁——或着应该说——呐喊。他们呼吁全世界的学者和大学，帮助他们抵制以色列的「学术毁灭」(scholasticide) 运动，并重建当地大学。正如 Sari Hanafi 在开篇的访谈专题中所言，学者和学术机构负有社会和道德责任。除此之外，我也想补充一点：如果面对阶级制度、殖民主义和独裁力量时，不主动展开抗争，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发展全球性的对话。■

Breno Bringel，《全球对话》编辑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刊出，请见[官网](#)

> 投稿来信寄至：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Breno Bringel.

助理编辑：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主编：Christopher Evans.

执行编辑：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区域编辑团队

阿拉伯世界：（黎巴嫩）Sari Hanafi,（突尼西亚）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Shaikh Mohammad Kais, Mumita Tanjeela, Abdur Rashid, Mohammed Jahirul Islam, Rasel Hussain, Md. Shahidul Islam,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Yasmin Sultana, S. M. Anowarul Kayes Shimul, Ruma Parveen Hashu, Rashed Hossai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yan, Khadiza Khatun, Arifur Rahaman, Md. Shahin Aktar, Suraiya Akhter,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Nur A Habiba Mukta.

巴西：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Ricardo Nóbrega.

法国/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兰：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Urszula Jarecka.

罗马尼亚：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 Elena Mihăilă.

俄罗斯：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湾：李宛儒, 吕道咏, 黄翊硕, 简芊楹, 赖奕玮, 林韵柔, 周芸瑄, 郭智豪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社会学对话」的部分，挪威社会学家Thora Bjørke Sandberg和Helle Haglund 与前ISA主席Sari Hanafi进行了和加沙正在进行的战争有关的访谈。



专题「南南合作和种族化」旨在突显支撑南南合作的更广泛的统治形式，以方便分析其他主要的全球合作挑战。



专题「开放运动」概述了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抗议和社会运动在当代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封面照片：普拉纳托宫，巴西利亚。出处：Lucas Leffa @lleffa, 2024.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赞助

> 目录

编辑的话	2	> 开放行动	
		瓜地马拉民主进程的关键106日	
		Ana Silvia Monzón, 瓜地马拉	31
> 社会学对话		智利修宪程序失败后的社会运动	
加萨战争与大学责任：专访 Sari Hanafi		Carmen Gemita Oyarzo Vidal, 智利	34
Thora Bjørke Sandberg、Helle Haglund, 挪威	5	对米雷伊政府反抗的开始	
		Julián Rebón, 阿根廷	37
> 南南合作和种族化		Ayotzinapa：十年来有罪不罚	
南南合作的阶层结构与种族化		Carlos de Jesús Gómez-Abarca, 墨西哥	39
Carolina Vestena, 德国；			
Eric Cezne, 荷兰、Marie Stiller	9	> 理论观点	
「全球南方」概念的未竟事业和其反种族主义理想		人口剩馀与错置，难民与移民	
Marie Stiller	11	Nadia Bou Ali、Ray Brassier, 黎巴嫩	41
非洲-中国相遇中的种族特点			
Eric Cezne、Roos Visser, 荷兰	13	> 议题开讲	
安哥拉和古巴开创性的南南合作（1975 - 1991）		是据为己有抑或利用？劳资冲突的生态面向	
Christine Hatzky, 德国	15	Simon Schaupp, 瑞士	45
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种族阶层能否被消除？		中东地区在数位层面的双重困境	
Sarah von Billerbeck、Kseniya Oksamytna, 英国	17	Mohamed Zayani、Joe F. Khalil, 卡达	47
		来自加萨学术界的公开信	
> 作为全球正义的逆成长与后开发主义		加萨学术界	49
逆成长，全球不对等与生态社会正义			
Miriam Lang, 厄瓜多尔	19		
女性主义去成长与生态社会转型			
Bengi Akbulut, 加拿大	22		
如何建立公正且受欢迎的能源转型？			
Tatiana Roa Avendaño, 哥伦比亚、			
Pablo Bertinat, 阿根廷	25		
(泛) 非洲生态女性主义运动			
Zo Randriamaro, 马达加斯加	28		

「在取消文化中，针对个人的抵制是较为常见的。然而，对制度的抵制所针对的对象，则是正在施行压迫权力的机构的集合。」

Sari Hanafi

> 加萨战争与大学责任： 专访 Sari Hanafi



Sari Hanafi在奥斯陆大学的巴勒斯坦营地。图片来源：个人档案。

Sari Hanafi 目前于贝鲁特美国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校阿拉伯与中东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伊斯兰研究计画的主持人。此外，他也是英国国家学术院的海外院士，并曾于2018至2023年间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的会长。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宗教社会学、巴勒斯坦难民的（强迫）移民社会学，以及科学研究政治学的文章与书籍。在阿克萨群众起义发生时，Hanafi正好居住在巴勒斯坦。作为一名叙利亚裔的巴勒斯坦人，他亲身经历了以色列所面临的空间杀戮（spacio-cidal）。在本次访谈中，他分享了一些自己对加萨战争的思考、呼吁在制度上抵制以色列当局，并指出现今针对这场战争的主流解释有哪些不足。Sosiologen.no是挪威社会学协会的一个编辑计画，其主要以奥斯陆为根据地，合作对象包括奥斯陆城市大学、卑尔根大学、挪威国立大学、奥斯陆大学和特罗姆瑟大学，本次的访谈即由此编辑计画中的两位成员：**Thora Bjørke Sandberg** 和 **Helle Haglund**在2024年五月进行。

Thora Bjørke Sandberg (TBS) 和 Helle Haglund (HH)：Hanafi教授，10月7日的袭击发生后，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件事是否影响了您对加萨战争的理解？

Sari Hanafi (SH)：这场战争从1947年就已经开始，并持续地于殖民化与抵抗殖民化的冲突之间，以不同形式延烧至今。我认为巴勒斯坦人10月7日的行动，只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而已。简单点

>>

说，2000年以来，以色列的政府以及民间舆论，就不曾接受奥斯陆的和平进程，甚至以暴力手段镇压阿克萨群众起义，在占领约旦河西岸、围困加萨犹太区的方式更是丑恶（[联合国统计](#)，被色列军队和移居至当地的以色列人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人的21倍，更别提大量发生的土地剥夺、非法定居事件等）。考量到这样的背景，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巴勒斯坦人用多美丽的方式做出抵抗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不过，作为一名关注社会与道德责任的社会学家，我也需要严正地指出：有人正利用以色列过去于该地的暴行，为哈马斯开脱罪责。

同时，也有一派人认为，要求生命受到威胁的巴勒斯坦人保持道德是不公平的。之所以不愿意于道德上批判哈马斯的行动，也许是因为我们并不曾生活于集中营里、也不会知道在同样糟糕的环境中，自己会如何行动或反应。总地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谴责所有不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的袭击；但与此同时，我也不会说被殖民者没有用暴力手段反抗殖民者的权利。

TBS & HH：奥斯陆大学最近拒绝对以色列进行学术抵制、谴责所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表示应立即停止针对加萨地区和以色列平民的攻击。您对这些立场有何看法？

SH：我会希望学者和学术机构能够负起更多的社会及道德责任。我相信我们有这样的义务——抵制任何与殖民主义或专制主义势力有关的机构，且不仅止于个人层面。我不仅要呼吁各位抵制以色列的学术机构，还要呼吁大家抵制叙利亚的大学。自由民主国家明明常常进行机构抵制，可是一旦对象涉及了以色列，同样的这些国家，却又以学术自由为名而不抵制。欧洲是一个好的例子——比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以及之前南非由支持种族隔离势力的掌权时。我记得2008年时，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一位巴勒斯坦同事，本来要参加一场办在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由欧盟资助的研讨会；在研讨会开幕的两天前，因为哈马斯胜选，邀请突然被取消。在我任职的贝鲁特美国大学，未经国务院资料库审查，我们是不能邀请任何讲者参加 Zoom 上的讲座的。要从美国国发署获得资金，就必须遵守这项规定。根据国务院的资料库，我们也不能邀请来自伊朗公立大学的学者。

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院以及联合国已经明确指出，加萨战争是一场具有种族屠杀意涵的行动。因此，不管是考量现实还是道德层面，我们都应该抵

制以色列的机构。早在2021、2022年，国际特赦组织、以色列人权组织 B' Tselem、Yesh Din 就主张以色列是一个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

我正好读完一本由以色列学者 Maya Wind 撰写的书籍 [《Towers of Ivory and Steel: How Israeli Universities Deny Palestinian Freedom》](#)，想要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清楚呈现了以色列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包含种族不平等如何镶嵌于以色列的法律中，以及当地的大学如何成为压迫的一环。比如说，台拉维夫大学就与以色列军方有许多合作，包含：培训士兵、允许军官在大学任教、提供法外处决所需的科技以及道德解释等。Wind在书中提到，「著名的『Erez』学士学位课程」，就是为战斗军事部队的军官开设；这个双主修的学程里，安排了军事取向的系列课程，以及另一组人文、社会科学、商业或工程学的课程。军方解释，Erez 学程中「交织着军事和学术训练」，而学员们将「从平民成为菁英战士」。另外八间以色列大学也是如此（其中两所位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其各自提供经以色列大学开发的专业知识、基础设施和技术，以支持以色列的领土、人口和军事政策。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色列人，则走向殖民考古（从巴勒斯坦领土上窃取文物）、法律研究、中东研究、安全国家培训等领域。

当然，我们也得肯定以色列学界培养出了一群伟大、勇敢的学者，即便面对强权，他们也勇于发声。例如 Lev Grinberg、Oren Yiftachel 和 Eva Illouz 等人。我与两位以色列哲学家、朋友 Adi Ophir 和 Michal Givoni 合编了一本书 [《The Power of Inclusive Exclusion: Anatomy of Israeli Rule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有趣的是，多数以色列的学者，现在都在以色列境外任职了。我知道他们是因为不堪受到骚扰，最终才离开了以色列学界。希伯来大学教授 Nadera Shalhoub-Kevorkian 就在合约遭到冻结后，被以色列警方逮捕、审讯。

TBS & HH：这是抵制，但 BDS（抵制、撤资和制裁）里面的另外两个部分又是怎么回事？

SH：现在大多大学的捐赠基金，都成为百万富翁拿去玩对冲的基金了。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惊讶。这些百万富翁周旋于美国、许多其他国家的军火和烟草市场，关注哪些投资有利可图——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获取最大利益。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我们一边在课堂上提倡「自由艺术」，一边又资助着军火／烟草一军事一独裁一殖民的共

同体。从以色列工业撤资，也是同样的道理——许多研究已经指出，以色列的工业与当地的殖民定居者、种族隔离军事政策有某整程度的合作。

TBS & HH：有些人可能会说，BDS是一种反犹太主义……。

SH：即便有些人会将以巴冲突视为二战之后，于悲剧的背景中诞生的民族主义竞合，但事实上，这就是一场殖民战争。即便推一步来说，我们接受前者的说法，在这场竞合里，也确实有一个民族，剥夺了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根据国际法，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萨的巴勒斯坦领土，都是被占领的。占领土地的人有着殖民和种族隔离的行为，而针对这些行为的反抗也确实存在。对我来说，讨论仇犹或反犹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如今，不管是在物质层面，还是透过影像的流通，这场正在进行的种族屠杀，使得所有相信人性的人感到愤怒。在这样的情况下，却有人以反犹主义这样的论述，迫使与这个重要议题有关的对话停止。在南非出现种族隔离政策、人们呼吁要对南非进行学术和经济抵制时，我就没不曾听过反南非或是反非洲之类的说法。我相信在欧洲学术界，抵制俄罗斯机构的情况仍是多数；我也不曾听到有人说这是反俄罗斯。当然，反犹主义确实存在于世界某处，但把它与反犹太复国主义、批判以色列殖民混为一谈，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

TBS & HH：也有些人会说，「从河到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的口号有反犹太主义的色彩。

SH：考量到多数行动者使用这个口号的方式，这样的全是绝对是错的。许多欧美地区游行的标语，以及社运人士的采访中指出，这个口号是要呼吁为所有居民建立一个民主、世俗的国家。意思是说，这无关当地如何被称呼，巴勒斯坦也好、以色列，或任何名称都行。就连哈马斯的三号领导人 Mousa Abu Marzouk 也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清楚提到，一国方案的内涵，就包括了一人一票，不论个人的宗教信仰为何。选择这样的口号，只是要反击「从河到海」政治下，以色列定居者于日常中的殖民行为。不要忘了，Netanyahu 自己的政党 Likud 的党章上，也有这个口号；只不过，这条河不是约旦河，而是幼发拉底河。

在欧洲，大屠杀依然很鲜明，我也可以理解，10月7日哈马斯不分平民、战斗人员的攻击，用极为强烈的形式唤醒了一些记忆。但同样一批老一辈的

人们也应该试着理解，为什么青年们会提出激进的口号——这反映了他们生而为人经历，比如他们如何亲眼目睹以色列军队杀害、饿死妇女与儿童，并摧毁他们在加萨的学校——一些学者将之称为「[scholasticide](#)」。必须承认的是，多数年轻人通常也不会媒体中接收到这些资讯：比较一下DW News和法国24频道与半岛电视台的内容，就可以大约知道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在校园内创造一个对话的空间，让不同的群体接触到不同的论点。

TBS & HH：你会怎么回应「机构抵制等于取消文化」的说法？

SH：在取消文化中，抵制个人是较为常见的，例如取消对演讲者的邀请、取消某人的地位等。然而，机构抵制针对的对象，则是正在施行压迫权力的机构的集合。国际社会公认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将机构抵制理解为最后的、和平的抵抗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以取消以色列文化为目标，而是要破坏大学一军事的综合体。倡议这样的抵制，并不妨碍我与两位以色列哲学家共同编辑一本书，我这么做，也正是意图邀请巴勒斯坦、以色列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任何声音都不应被取消。

TBS & HH：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还有可能是中立的吗？

SH：沉默意味着共谋。过去数十年，大学一直是抗议、公开讨论和针对霸权政治表达不同意见的空间，从越南战争到南非种族隔离时都是如此。大学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空间，但只有在存在有力的反论述时，这个空间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我反对从任何层面，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种族、性别上，取消他人文化的意图。

TBS & HH：你创造了「空间屠杀」（spacio-cide）这个概念，他指的是什么？在10月7日的攻击发生前，你如何看待人们对巴勒斯坦局势的关注与认知，或者说，人们在这方面缺乏了什么？

SH：1999至2004年间，我住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当时正是[阿克萨起义](#)的高峰。那时候，我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及冲突的政治社会学都很感兴趣，因此提出了「[空间屠杀](#)」的概念。长期以来，以色列的殖民与定居政策，都可以说是一种「空间屠杀」（而非种族屠杀），其是以将巴勒斯坦

人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生活空间中驱逐为目标，并借此迫使巴勒斯坦人必须进行人口迁移。

空间屠杀的基本逻辑，是提供犹太人更多的土地，并减少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其是一个蓄意且动态的过程，与持续变动的环境（包括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相互作用，也是各种杀戮（-cides）的顶点——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流动、杀害巴勒斯坦领导人（政治杀戮）、窃取巴勒斯坦农业所需的地下水及破坏巴勒斯坦人的经济能力（经济杀戮），进而使人们难以生存于巴勒斯坦土地上。借由描述、批判以色列军事—司法—民事机构的多个面向，我借着这个概念指出，空间屠杀之所以能够实现，有赖于以下三个原则：殖民化（没收更多土地）、隔离（以色列土地和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在这两项看似矛盾的原则之间进行调解的例外状态。目前以色列的殖民计画，已经从空间屠杀转变为种族屠杀。

TBS & HH：最后一个问题，展望未来，您对巴勒斯坦／以色列接下来的情况有什么看法？我知道这是个大问题。你会说自己是正向、充满希望的吗？你有什么比较理想的想像吗？

SH：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亲眼目睹了以巴冲突的残酷，因此很难设想出一蹴可几的一国方案形式，不过，如果是两国方案的话，可能会是我们在以巴地区建立多民族自由民主的第一步。这意味着，我们得建立两个意愿：一个议院体现「一人一票」原则，处理与所有公民相关的事务；第二个议院中，两个民族群体（犹太人、阿拉伯人）将就其日常自治问题展开讨论。我的以色列同事、社会学家 Julie Cooper 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想法。虽然这样说，这样的概念仍然脱离不了2007年由 Nadim Rouhana、Nadera Shalhoub-Kevorkian 等人共同撰写、多名巴勒斯坦学者／倡议者签署的《海法宣言》当中，所提倡的精神，然而制止以色列当前于加萨地区的种族屠杀，仍然是更为紧迫的。我们对于这场战争当中的共犯——包含主流政党、许多大学的管理部门，感到极为愤怒。我认为这份怒火，也应该要能向世界各地的新一代、学生们传达，并鼓励他们将其表达出来。用 Rana Sukarieh 的话来说，他们的抗争，恰恰反映出了反殖民主义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愿景。我愿为这场动员欢呼！■

来信寄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mailto:sh41@aub.edu.lb)

Twitter: [@hanafi1962](https://twitter.com/hanafi1962)

> 南南合作的 阶层结构与种族化

Carolina Vestena, University of Kassel, 德国; Eric Cezne, Utrecht University, 荷兰; 以及Marie Stiller*



1955年4月20日，各代表团在万隆独立大厦举行亚非会议的期间举行了经济科全体会议。
出处：公共领域。

南南合作 (SSC) 是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动态。过往的例子包括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泛非主义，它们都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非洲和亚洲去殖民运动的背景下。近期——尤其是 2000 年后——的例子，是大宗商品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北方主导的全球化日益失望的背景下，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等新兴大国——以及金砖四国等各自的集团——因而开始寻求战略商业夥伴关系和政治影响力。关于南南合作和潜在反霸权关系的说法虽然不是新现象，但近年来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然而，南南合作不仅仅是金砖五国为了增强政治或经济实力。[更广泛地说](#)，南南合作也跟资源、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转让与交流有关。包括各种形式的人际接触，通过在商业、教育或劳动力迁移等领域的机构合作，或国家与私人行动者间，在「全球南方」的迁移。南南「团结」、「友谊」和「互助」等术语经常被用来描述与合法化南南合作的战略和实践。这样的战略和实践，更横向也更适合南方国家的利益和发展条件。

对南南合作的这种积极看法旨在强调全球南部国家的能动性、独立性和机敏。正如对「全球南

>>

方」概念的[历史分析](#)所揭示的那样（例如，参见本期 Stiller 的文章），它也巩固了「全球南方」本身隐含的多元概念。在倡导替代性全球化或应对气候危机的新方法时，社会运动的[跨国网路](#)也唤起了南南团结的积极概念。南南合作的积极形象能够从各个角度——从「下」或从「上」——被提及。

但是，如果南南合作——作为一个政治项目、国际秩序中的一种典型做法，以及强调南方行动者能动性的一种概念的启发——本质上如此乐观，我们又该怎么解释这种合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和阶层制度呢？

[关于南南合作的批判性文献](#)已表明，国际间不存在中立的合作，因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反映了（国内）社会的统治关系。许多文献批评了建立在资本主义逻辑之上的全球阶层制度。例如，Du Bois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秩序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力量也体现在维持种族化的阶层制度以及全球北方和南方国家的劳动分工上。这种解释试图将资本主义结构和种族化阶层制度结合起来，对于反思国际秩序中统治关系的复杂性至关重要。

然而，多数南南合作相关研究仍仅关注于经济与政治阶层，而忽略了种族化的要素——亦即，这种关系是否/如何受到种族化。这可能使得我们对全球合作的挑战及其本质上的冲突的理解趋于单一。并且，这也使得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南南合作要借由传播南方的友谊和相互合作的叙事来争取话语上的合法化。

我们认为，要分析全球合作所面临的挑战，就必须着眼于有哪些支配形式巩固了南南合作。我们也认为，要对南南合作进行多维度分析，就必须研究不同层级的冲突，无论是国家、国际机构，还是

当地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友谊和互助的叙事掩盖了巩固这些国际合作成就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和阶层地位，但我们依旧寻求可能考虑到上述复杂性的相关研究，为[南南合作新兴研究领域](#)做出贡献。

接下来的一系列文章将显示，在官方宣称对称合作和相互帮助的理念背后，南南合作的真实经历具有下述两种特质——人与人之间的种族化与制度化的种族化，这些种族化的型态造成了阶层制度与差异化。种族化进程也在国际层面上借由机构和行动者框定了「他者」（即被视为不同种族的人口，通常/最常见的是黑人公民）的视角。

由于相关文献主要强调经济和政治阶层制度，即使我们知道阶级、性别和公民位阶等各种因素都会导致全球阶层制度的形成，但我们仍将重点放在种族化的实践上。我们在讨论南南合作时，从不同方面来反思、探索种族化这种有问题的社会现象。首先，我们思考种族化在南南合作中，是怎么以阶层化和「合作者——分化」的构建形式呈现。另外，我们也讨论了种族化在不同层级和不同行动者组合中的作用；例如，涉及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运动的南南合作。最后，考量到南南合作中地缘性的发展、投资计画、教育计画、或行动者对国际机构的看法等，我们认为这些贡献可以为南南合作如何在当地形成种族化提供一个基层视角。

关于南南全球合作中种族化问题的这三个方面的讨论，一方面可以为全球合作——尽管其目的便是为了改变「全球南北」之间的权力失衡——中的权力动态提供更加细致的视角。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也帮助我们思考种族阶层制度在社会中的结构性作用、与其他统治形式（如性别、阶级或民族阶层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全球秩序的不同层面长期存在时。■

*作者使用笔名

来信寄至：

Carolina Vestena <carolina.vestena@uni-kassel.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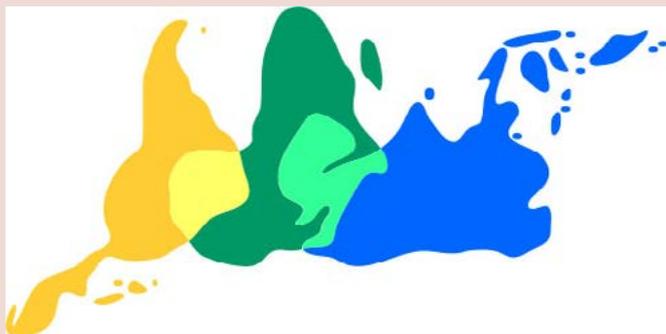
Twitter: [@carolinavestena](https://twitter.com/carolinavestena)

Eric Cezne <e.m.cezne@uu.nl>

Twitter: [@eric_cezne](https://twitter.com/eric_cezne)

> 「全球南方」概念的未竟事业和其反种族主义理想

Marie Stiller (笔名)



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出处：全球多数维基百科技术优先享有者。

1955年4月18日，印尼总统Sukarno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在演说中将「全球南方」国家与种族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民族，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模式。[.....]我们的种族不同，甚至我们的肤色也不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类的团结或分化并非只因为这些因素。冲突不是来自不同的肤色，也不是来自不同的宗教，而是来自不同的欲望。我确信，比起那些表面上将我们分开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因更重要的东西而团结在一起。例如，我们因共同憎恨殖民主义而团结在一起，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因共同憎恶种族主义而团结在一起。我们因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而团结在一起。」

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支持和平的计画在此现身。然而，本论坛显示了南南合作过程是如何以许多不同类型的种族化历程被标志的。如果全球南方确实有一个反种族主义计画，那么它所提出的承诺仍未兑现。

> 种族化和全球南方

种族化在这里被理解作为一种实践，通过这种实

象。种族化使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阶级结构得以维系。种族化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研究导致种族不平等或种族主义的实践。此外，使用此一术语还可以避免「种族」这个没有科学基础的假定生物学范畴（见本专题导言）。

虽然反种族主义的理想尚未实现，但全球南方作为一种社会想像，一直被用来在前殖民国家、体制和人民之间营造一种归属感。尤其是各国政府，经常使用全球南方集体的语言作为战略性修辞工具，[去正当化国际合作](#)或「开发计画」。

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一种社会建构，其部分正当性来自于其所宣称的反种族主义，但这种反种族主义仍有欠缺。这篇简短的文章旨在根据上述内容对「全球南方」概念提出质疑。

> 三位一体的概念

总体来说，「全球南方」的概念[非常模稜两可](#)，概念化程度不足。作为一种社会想像，它可能会维系而不是战胜一系列不正义，包含种族不正义。

[Schneider](#) (2017) 将「全球南方」概念分为三大类：地理上的全球南方、底层的全球南

>>

方以及作为灵活隐喻的全球南方。地理上的「全球南方」是最常见的用法，它将「全球南方」定位在那些被视为结构上未开发和贫困的前殖民世界地区（前「第三世界」）：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一地理概念在当代论述中占主导地位。它被联合国等强大的超国家体制所使用，并立基于一个国族和国家间的视角。

全球南方的第二种模式最早由 [Alfred López \(2007\)](#) 提出，涉及全球各地的「底层人民」：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类，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知识上都被剥夺了权力。他们是「全球的」，因为他们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虽然López将「南方人」与地理位置相分离（南方人无处不在），但他最终将「南方」归结为「阶级」。

最后，第三种解读将「全球南方」视为一种灵活的隐喻，不能将其化约为地理环境（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或社会固定要素（如阶级）。相反，它是关系性的。这第三个概念在所谓强大的北方和贫困的南方之间划出了一条隐喻边界。举例来说，它可以是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间的边界，也可以是富裕的德国人和被剥夺公民权的德国人之间的边界。它是抽象的，因为它是「灵活的」。它既可以涉及地理上和社会上的差异，以及任何形式的不平等。

仔细观察，这三种概念化都各有利弊。而且，它们都与特定的历史时刻或发展有关。当我们问及：「全球南方」是何时首次出现的，它又是何时取代「第三世界」概念的？

从历史上看，这一术语的兴起与去殖民化时期以及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认同兴起有关。在万隆会议（1955）、1961年不结盟运动（NAM）和1964年77国集团成立之后，「全球南方」一词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开始被广泛使用。它逐渐取代了「西方」和「东方」以及「第三世界」等词汇，后者已成为一个贬义概念。「全球南方」一词与更平等的经济秩序愿景以及争取国家间和地区间平等的抗争联系在一起。它包括呼吁全球北方承担新的责任。

> 异质性、内部分化和过度简化的危险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全球南方」在历史上最古老、最常用的解读方式：地理解读，是一个太不成熟的范畴，无法描述「真实」的世界。例如，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且日益增长的）多元性。中国、巴西、印度以及南非（南方金砖五国）很难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索马利亚相提并论。相反，中国和巴西已成为许多非洲地区的全球股东，而「南方」标籤却明显掩盖了这一发展。此外，地理解读忽略了这些南方国家内部的显著分化：这些国家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如Vijay Prashad在其《[全球南方的可能历史](#)》（2012）中所描绘的，南方从来都不是一个同质的实体，而是沿着意识形态的战壕（如围绕新自由主义）而被分割开来。

然而，最关键的是，这种地理解读忽略了这些「南方」国家内部在阶级、种族、性别和地区方面的显著分化。López的底层全球南方概念试图指出「阶级」分化，甚至承认贫困往往是种族化的，本质上借鉴了「阶级」的范畴。

因此，如果说至今为止所有关于全球南方的概念都未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世界，那么它们所淡化的，尤其是围绕种族化历程的不平等现象。正如本专题所示，我们缺乏一种超越黑白二元对立，和以欧美参考架构为中心的二分法概念。

即使Sukarno南方的反种族主义理想尚未实现，但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想像，仍在前殖民地人民和北方学者的集体意识中不断被召唤。许多学者和参与的知识份子在没有替代术语的情况下使用它，但它也经常被用来追求一个更公平、社会更进步的世界：继续呼吁建立一个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支持和平的世界（Schneider, 2017）。

仍然，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同质的实体，而是一个通过宣称但却未能实现的反种族主义的立场，而部分正当化的社会建构。因此，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一概念有可能使我们对新形式的种族化、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视而不见。■

* 作者使用笔名

> 非洲-中国相遇中的种族特点

Eric Cezne, 荷兰乌德勒兹大学, 以及 Roos Visser,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国路桥集团 (CRBC) 在塞内加尔Thiès建设ILA Tours高速公路。
出处：杨一帆

2020年，在全球疫情与世界性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所带来的强力合流之中，发生于中国广州市的[事件](#)重新引发了非-中关系中种族主义问题的相关讨论。为预防和遏制新冠肺炎而执行的措施不成比例地针对着非洲人与非洲人的后裔。许多非洲人面临着被驱逐、无家可归以及公共空间中的歧视，引起了非洲侨民与政府的强烈抗议。

非-中关系[长久以来](#)被描述为以南-南团结和同情 (South-South solidarity and empathy) 为基础的友谊。这种描述的显着性增长——特别是自2000年代初以来——带来过量 (plethora) 的机会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挑战。相互间的旅游、移民以及生意往来的激增促进了充满活力的交易、投资与文化交流。然而，愈发频密的接触也导致了种族歧视、怀疑与隔离的发生，近来的广州事件即是一个例证。

非-中关系中的种族主义与偏见乃根植于复杂

的历史及全球动态。重要的是，由于种族主义表现以不同形式，这些问题并不仅限于中国对非洲人的看法的待遇。种族化 (racialization) ——即将人种的含义与分级化 (classifications) 扩展到社会关系——双向地发生，对在中国的非洲人与在非洲的中国人都产生影响。

> 非洲人在中国

除了广州的情况，许多反-非（特别是反-黑）情绪的案例在中国各地都留有记录。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1980年代的「[校园种族主义](#)」，非洲学生遭受来自中国同侪的出于种族动机的强烈反对 (racially motivated backlash)。非洲人被描述为透过与中国妇女的关系而「污染」了中国社会，他们被认为是既落后又懒惰，不值得中国的援助。

如此的种族主义思想持续很久且已经找到了诸如微信和微博这样的[中国社群媒体管道作为平台](#)，在其中遭遇到针对非洲人的种族毁谤并非罕见。中

>>

国用户经常以中国近来的成就和发展作为参照，对非洲或非洲人建构一种贬损的形象。透过将非洲人种族化（racializing）为懒惰的、不值得的以及性侵略的（sexually aggressive）人种，中国人寻求将自身定位为勤劳的、值得的以及备受尊敬的人种。此种描绘反映了在中国的黑色（Blackness）与种族认同之[历史建构](#)，此种建构经常与文化 and 种族优越——特别是佔支配地位的汉族（Han group）相对于外国人或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的优越——的观念纠缠在一起。

今天，大概有五十万的非洲移民居住在中国，在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中经历着种族主义的不同感知。有些感到受欢迎并将歧视行为归结为无知，另一些则遭遇到极具偏见的对待。通常，中国的种族歧视主要被视为是制度性的。与 1980 年代的「校园种族主义」不同，今天的冲突常常发生于（非法的）非洲居民与敌对当局，后者被视为[对非洲人不公平地实施移民与执法措施](#)。许多人[指责非洲政府](#)因为担心与中国的双边经济和政治协议受到损害，从而没有解决其公民在中国的不满。而与非洲公民在中国面临的挑战相比，中国移民在非洲取得签证和许可证的方便，无疑加深这种挫折感。

中国政府持续性地淡化种族争议，将反-非情绪视为独立情况，并坚持种族主义是一个西方问题。无论如何，随着已广传的广州事件和非洲侨民与政府的强烈抗议，中国当局已不得不谨慎地承认种族偏见的存在。在特定的情况下，诸如[改善外国人对健康程序系统的访问](#)以便能在疫情期间进入公共场所等，这些表面上的（token）措施已经被采取以抑制歧视性的实践。

无论如何，这些措施倾向于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视为偶然及局部性的问题，而认为不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特征。根深蒂固的挑战依然存在，只因中国严格地限制包括反种族主义议程的人权倡议和运动。尽管中国政府已严格管控政治和媒体空间，对于抑制中国（网路）社会中的种族主义言论与行为却没有什么显著的作为。

> 中国人在非洲

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情况，种族歧视与张力则一般在劳动关系——特别在中国建设计划——的脉络中被讨论。中国雇主、经理人与劳工因在提及被他们描绘为懒惰、不可信赖以及不可信任的非洲

同事的工作习惯和做法时呈现出种族主义行为而遭受[批评](#)。中国人还因[自我隔离的行为被谴责](#)：由于不喜欢多样性，他们选择在居住、语言及社会化实践方面将自身隔离于非洲人。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警告](#)不要对中国人在非洲的种族主义进行笼统的解读。我们被提醒劳动不平等和自我隔离的样式已长久（且持续着）地是西方在非洲大陆存在的一大特征，且也有许多中国人在非洲习得语言及融入社会的成功案例。

同时，非洲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s）中也出现了明显的敌意和反-中（anti-China）情绪。[有一种思路认为](#)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种族化也应当被纳入考量，承认非洲人的能动性。非洲的反-华（anti-Chinese）态度主要来自与中国企业家和劳工有直接竞争的经济群体，例如那些失业或经历到危脆的（precarious）工作条件的人士。通常，被描述为在非洲进行掠夺和新殖民运动的「[黄色灾祸](#)」（yellow peril）的中国人形象——这在西方政策和媒体描绘中很常见——促进了上述情绪的扩大。这显示了非-中关系是如何被外在行动者加以种族化的，涉及了白性（Whiteness）、黑性与华性（Chineseness）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非洲领导偶尔会利用针对中国人的负面情绪来获得政治利益，有时会[诉诸种族民族主义策略](#)（strategies of racial nationalism）。对中国的批评可以作为统治精英在脆弱时期转移审查和巩固政治权力的方便工具；而反对派团体则会利用反-中言论来挑战现任政党。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 2011 年在一个反-华基调上竞选总统的尚比亚政治家 Michael Sata。然而，他在上任后改变了他的言论并积极追求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然而，不停地脉络化这些动态并区分当地、国家和超国家的层次是至关重要的。在许多非洲国家，当地居民[普遍欢迎](#)中国人，讚赏中国的投资、贸易与整体发展成就。然而，尽管非洲人看重与中国的关系，但正如非洲联盟副主席 Kwesi Quartey 在回应广州在疫情时期对于非洲人展现的敌意时[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并未准备好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凸显了种族相关议题的政治重要性和双方有意义地参与其中的必要性。在不断变化——且挑战越来越多——的全球时期下，这么做对于维持和强化所谓中非友谊（Sino-African friendship）是重要的。■

来信寄至：

Eric Cezne <e.m.cezne@uu.nl>

Roos Visser <rv_visser@outlook.com>

> 安哥拉和古巴

开创性的南南合作 (1975 – 1991)

Christine Hatzky, 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 德国



1975年，安哥拉指挥官和东线古巴少将，Dangereaux Kimenga和Carlos Fernández Gondín。出处：Alfonso Naranjo Rosabal / Wikimedia Commons

南南合作的特点是什么？在某些案例下，南南合作首先涉及两个前殖民地国家的政府、体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合作。我将以安哥拉和古巴为例加以说明，并概述产生这种合作的特殊性和历史脉络。该项目发生在去殖民化时代，当时的背景是世界分为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色是，人们仍然希望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强大凝聚力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打造出超越这两种体系的自身发展道路。

古巴和安哥拉的案例是两个左翼计画：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和古巴政府之间的合作。前者尚未确定最终方向，后者则致力于社会主义，但试图克服苏联体制的政治限制。基于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两国之间的合作旨在建立一个反对美国霸权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跨大西洋联盟。由于安哥拉当时（至今仍然）拥有丰富的原物料（石油、矿物、钻石），这种合作为古巴提供了从苏联获得更多经济独立（从而获得更多政治独立）的展望，以及规避美国政府在1960年实施的经济封锁的机会。

虽然这是一个平等的合作，但并非完全没有阶级之分，每一方都在追求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当然，这些阶级制度也包括双方的种族主义假设，但这些假设并没有得到处理，至少在正式论述中没有得到。在去殖民化的历史脉络下，国际主义团结的论述中没有种族主义的空间。现有的阶级制度和种族化反而被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团结言论所掩盖，其目的是加强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解放运动与独立政府之间的凝聚力。

> 民间合作与军事支持

1975年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战争结束后，在随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与竞争对手，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以及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联盟的后殖民战争中，约40万古巴兵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部队并肩作战直到1991年。从军事合作开展的民生合作，由于独立后的安哥拉所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军事支援：包挂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各领域的重建援助。因此，独立后的安哥拉总统

Agostinho Neto请求古巴政府提供额外的民生支援，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领域。古巴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并通过各级专家和熟练工人提供了自己的技术知识，截至1991年，约有5万名古巴市民在安哥拉工作。这些人包括各部会的顾问、医生、护理师、工程师和老师，即便内战仍在肆虐，他们仍旧支援所有这些领域的基础结构发展。

这些支援最初是作为自助性质的，但由于缺乏足够资格的安哥拉人，古巴人不得不在许多领域挺身而出。该计划根据安哥拉的具体需求量身定制，由安哥拉-古巴两国小组负责谈判和协调。详细的合约规定了民生合作的条件，包括支付服务费用。安哥拉政府直接向古巴政府支付工作费用，双方共同为合作者提供住宿、交通、食物以及少量津贴。1988年，南非、古巴和安哥拉签署了《纽约协定》，宣布古巴和南非军队及市民撤出安哥拉，纳米比亚于1990年独立，这是种族隔离制度瓦解的又一个里程碑。

总之，这是历史上两个前殖民国家之间规模最大、最全面的南南合作。合作中的种族阶级问题十分复杂，取决于是从安哥拉还是古巴的视角提出。我在我的出版物中根据对参与合作的古巴人和安哥拉人的访谈，探讨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合作计划的个人观点和相互理解，使我们深入了解现有的，和已知的阶级制度的不同面向。

> 透过殖民主义和奴隶制联系起来的国家

从历史脉络出发是我们了解这一合作计划的背景与动机的关键。16世纪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两国联系在一起。直到19世纪末，约有一百万名非洲人被驱逐到古巴的蔗糖种植园。其中许多非洲人后裔参与了古巴反抗西班牙帝国的独立斗争（1868-1898）。1975年，古巴国家元首卡斯楚在解释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军事合作时提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古巴人在

历史上欠了非洲兄弟们的债，有义务支持他们反对葡萄牙人的独立斗争（1960-1975），并将古巴定义为「拉美非」国家。

由伊比利亚殖民主义下的共同经验所产生的文化和语言兼容性至少对促进合作产生了作用。在当时，这些共同点比安哥拉人和古巴人之间的种族阶级观点更为重要。1959年的革命加速了古巴人民克服殖民统治和后殖民统治的进程，古巴人民的国际主义与去殖民化、平等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前卫计划息息相关。

> 全球去殖民化与Tricont的出现

古巴摆脱美国帝国主义控制（美国于1898年取代西班牙殖民主义成为美洲霸权国家）的革命发生在全世界去殖民化时代。1955年，超过29个主权国家和30个解放运动在万隆（印尼）举行会议，讨论结束殖民主义的问题。在那里，「第三世界」（后称Tricont）一词象征着与「第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以及「第二」社会主义世界（除了中国）相对的「第三条路」。

1950年代末期随着非洲殖民主义的结束，古巴革命者与那里的反殖民运动和政府建立了联系。1961年，冷战达到高潮，古巴导弹危机使世界濒临核战边缘，不结盟运动在贝尔格勒成立，古巴是唯一参加的拉丁美洲国家。1966年，「三州会议」在哈瓦那举行，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82个反殖民运动和政府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在「国际主义团结」的精神下，筹备古巴领导的世界反殖民革命。1970年代初期，古巴成为「第三世界」中第一个被接纳为中东、北非和非洲的社会主义经济共同体，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的国家，以确保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存续。这种来自东方集团国家和苏联的经济支持使古巴得以与安哥拉和许多其他Tricont国家建立广泛的南南合作。■

来信寄至：

Christine Hatzky <christine.hatzky@hist.uni-hannover.de>

> 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种族阶层能否被消除？

Sarah von Billerbeck，英国雷丁大学，以及 Kseniya Oksamytna，英国伦敦大学



出处：Sarah von Billerbeck

当代全球系统中最重要的国际合作之范例即是联合国 (United Nations)。它汇集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涉及了多种合作向量 (vectors)：北-北、北-南以及南-南。确实，联合国存在的前提是根据如下假设：能够使各国平等地进行有结构的合作之制度化公共场域 (fora) 将会在避免冲突、促进人类权益以及确保正义上有所助益。然而在联合国中国家间的平等长久以来备受质疑，且近期的研究显示不仅是联合国的结构透过对决策过程的差别权限（特别在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比如联合国安理会即是这样的情况）来制度化国家间的不平等，但这些结构通常在起源上是种族性的因此其中的阶层也已是种族化 (racialized) 的。正如本专题的导论所述，我们将种族视为一种涉及了对以被视为不可改变的特征为基础的群体进行他异化 (othering) 和等级化 (ranking) 的社会建构，这将反过来导致对社会、政治以及物质资源的不平等权限。

尽管承认联合国各成员国之间的种族不平等，一直到最近，学者们都未能成功检查到这种阶层结构是如何在联合国中——即在组织自身的劳动力 (workforce) 中——存在、被复制从而根深蒂固的。在我们近期一篇题为〈种族与国际组织〉的[文章](#)中，我们对联合国维和部队 (UN peace-keeping) 进行研究，并借 [Ray \(2019\) 的种族化组织之理论](#)，找出联合国内部种族阶层结构得以延续的四种机制的证据。

> 差别的作用、种族化的分配、资格认证化与种族脱钩

首先，我们观察到来自不同种族群体人员的作用 (agency) 的削弱或增强。由于过去 20 年来所有新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都发生在非洲、亚洲或加勒比地区的非白人主导之国家 (non-white-majority countries)，上述情况在国际的 (international) 与国内 (national) 工作人员之间的区分上尤为明显。后者通常担任诸如司机或翻译员的辅助型角色，有时候也被要求提供在地文化知识。这些角色的价值低于所谓「实质性」 (substantive) 的工作，因此，国内工作人员集中在组织内地位较低的种族型工作 (race-typed jobs) 中。而国内与国际工作人员之间的巨大[薪资差异](#)更加剧了这种情况。透过表面地 (tokenistic) 将非白人安排在高阶职位上，维和行动中种族化之群体 (racialized groups) 的作用 (agency) 也被削弱。

其次，我们找到了组织资源分配种族化的证据。维和人员的其中一项关键资源即是人身安全 (physical security)，而这竟是白人工作人员能够加以贮藏的资源。在文职维和人员中，国内工作人员[面临着高风险](#)，是比国际工作人员所面临的还更难缓解的：比如在危机期间他们通常不会被撤离。相似地，来自非白人主导之国家的部队，比来自白人主导之国家的部队被曝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下。例如，在马利的马利稳定团 (MINUSMA) 中，具备更好的装备与科技的欧洲部队承担了侦查和情报任务，而更危险的巡逻任务则留给了非洲部队。

>>

第三，我们找到证据显示白性（whiteness）可以充当一种资格认证（credential）。在维和部队中某些任务或技能会被视为更具声望的，比如军事策划或提供人权或安全部门改革的专题知识。白人国际工作人员经常被假定能够胜任此等角色，而非白人国内工作人员则被视为与在地或文化知识相关，后者被认为是较不「精细」的（less “sophisticated”）。在军队方面，白性与专业性的联系更为紧密，体现在如下[劳动分工](#)上：从欧洲或北美来的白人部队被指派为策划和战略的角色，而[巡逻和执行作战](#)的任务则由从亚洲以及特别是非洲来的非白人部队负责。

最终，我们找到了种族脱钩的证据，即白人部队坚决要求能规避组织规则的特殊待遇。举例而言，来自白人主导之国家的部队要求特别运输安排、更大的口粮配给并达成了双边医疗及撤退协议。虽然这些安排在技术上并不违反联合国政策，但它们强化了如下观念，即标准的联合国程序对某些人——来自非白人主导之国家的部队——是足够好的，但对另一些则不。事实上，向维和行动提供部队和警察能够为国家带来许多[好处](#)，比如[报销经费](#)和[防止政变](#)。然而，这通常意味着这些国家——[超过百分之九十](#)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为其人员协商有利条件的能力不如全球北方国家。

这些种族阶层都是联合国成员之间之间权力与财富分配不均、特定组织程序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ies）以及联合国人员个人偏见下的产物。我们要问，拆除这些阶层是否是可能的？

> 联合国在促进官员间平等的努力

联合国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其劳动力中种族不平等与种族偏见的问题。在 2020 年，随着黑命贵抗议（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s），秘书长 António Guterres 启动了一系列行动，例如联合国秘书处解决种族主义和促进全人类尊严（Addressing Racism and Promoting Dignity for All）之工作小组。同年[一份关于工作人员想法的问卷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联合国秘书处员工相信组织的招募作法存在着基于种族、国籍和族裔的歧视。差不多相同比例的人数表示曾经遭受歧视，其中的黑人或非洲人尤其深受影响。

在2020年，联合国任命了一名多样性和参与事务主管(Chief of Diversity and Engagement)并为联合国解决种族主义和促进全人类尊严小组设立了特别顾问一职。而秘书处也要求拨款来发展多元性、公平与宽容办公室（Office of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然而却没有得到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批准](#)。

联合国也已经增加了某些类别的国内工作人员的薪金。比如，在中非共和国，最高阶专业类别的国内工作人员的年薪高达 84,735 美金，相当于中阶国际工作人员（P-3）77,884 美金的年薪。然而，这没有包括国际工作人员领取的各种津贴。一般服务类别（General Service category）——大多数国内工作人员都从属于此类别——中国内工作人员的最低收入是每年仅领取 7,690 美金。

此外，一个跨部门的反种族主义行动组（Anti-Racism Group）也在管理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任务部门内设立了。讽刺的是，联合国在其日内瓦总部发布了[无薪实习机会](#)的广告以支持这个小组的工作；此一无薪实习仅开放给那些经济独立的个体（译按：意思是，若非经济独立者，不大可能报名申请这样的无薪实习），这些人通常都来自白人主导之国家，而这恰恰使该小组声称要解决的不平等现象得以长存。

最终，联合国启动了一个[内部沟通平台](#)以重申反种族主义讯息，然而这仍然可能是纯粹的[自我合法化的手段](#)，特别当它是仅局限于单向的、自上至下的沟通模式。其它的措施，诸如针对无意识偏见的培训以及对过去歧视申诉的审查，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改变。有鑑于这一切，秘书处在结构仍旧不变的情况下作出的任何解决种族主义的计划，其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来信寄至：

Sarah von Billerbeck

<s.b.k.vonbillerbeck@reading.ac.uk>

Kseniya Oksamytna

<Kseniya.Oksamytna@city.ac.uk>

> 逆成长，全球不对等与生态社会正义

Miriam Lang, Universidad Andina Simón Bolívar, 厄瓜多尔



2024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反对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抗议活动。
出处：Miriam Lang

逆成长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的北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和北美国家的角度出发，并服务于这些国家。关于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许多主张逆成长的人清楚指出，逆成长议题并不适用在普遍的转型中，他们也不认为有什么方法能普遍适用于世界所有地区的转型。相反的，他们指出，北方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借由逆成长，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或经济体「扩大生态空间」或「[解放概念空间](#)」，让它们得以「[找到通往其所定义的美好生活的道路](#)」。另一种论点也补充到，全球南部较贫穷的国家需要借由发展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这种观点从主流社会对贫困、需求和福祉的理解出发，将其与物质的丰裕和匮乏相连结。但从全球南部最近的辩论来看，这种理解似乎值得商榷。

本文试图从实现全球正义的生态社会转型的角

度出发，勾勒出「逆成长」的一些优缺点，并探讨在此背景下与一些全球辩论相互促进的可能性。全文围绕两个主要论点展开：首先，我将总结逆成长——作为一项运动和研究议题——与全球南方之间现有的对话、共鸣和（不）参与。其次，我将强调「北方的逆成长将为南方打开空间」这一说法的局限性，指出某些辩论可能有利于逆成长，反之亦然，并建立反对（绿色）成长的非殖民主义南北联盟。

> 逆成长与南方替代模式的加乘性

就像逆成长的支持者所提到的，[逆成长的概念在全球南方不具有很强的动员力](#)，因为当地的人们依旧受「未开发」的观点所局限。但也不需要让「逆成长」成为南方国家转型的指导方针。[Arturo Escobar](#)、[Eduardo Gudynas](#)、[Alberto Acosta](#) 等拉美作家已指出，逆成长与后开发主

>>

义、后发展以及 *sumak kawsay* 等原民世界观之间，存在某些聚合性和加乘性，我们应从必要的南北联盟的角度进一步加以探讨。

sumak kawsay 和逆成长都反对无限制的进步和扩张的现代观念，在对于何谓美好生活的问题上，两者都更加注重品质而非数量。两者也都反对现代资本主义所助长的无止境需求的观念，而主张有所限制：去增长认为「[限制不是外部强加给我们的东西，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自制的选择](#)」，是一种集体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激进的民主实践；*sumak kawsay* 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式的积累，因为 *sumak kawsay* 旨在重新平衡新出现的不平等，并将其视作对社区生活的威胁。*sumak kawsay* 也鼓励合作和互惠，反对竞争。*sumak kawsay* 和逆成长都将自主、集体自治或自由视为将行为规则加诸于自身，因此这也意味着对自身的限制，而非遵循任意或外部强加的规则。

然而，虽然必须承认拉丁美洲的逆成长方式与替代观点之间有着丰富的概念对话，但从全球对话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逆成长的支持者主要是「从全球北方出发并为全球北方」制定政策建议，而没有分析现代殖民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深刻纠葛和相互依存关系。

> 尚有不足的北方逆成长

如前文所述，逆成长相关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论点是，全球北方高收入国家的逆成长将为全球南方国家「解放概念空间」或「生态空间」。一些作者，如[Jason Hickel](#) 甚至主张逆成长是一种去殖民化战略。我非常同意 Jason Hickel 的观点，即南方国家不应该服务于北方的成长，而是应该满足自身需求，自由地组织资源和劳动力。尽管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地区间和全球的联盟，并且需要改变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制度和规则，才能为南方国家创造足够的发展空间。

让我们回顾一下拉丁美洲最近的经历。尽管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一些或多或少以左翼为导向的政府声称要摆脱新自由主义，克服开发主义，并在该地区建立特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但这些国家未能实现真正自主、源于内在的、可持续的地区整合。相反地，它们相互竞争出口原材料，服务于中国和其他大型经济体的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豁免拉美国家政府的所有责任，忽视地区内部力量的不平衡，是一种短视的做法。

然而，他们也在全球贸易、知识产权规则、金融和债务动态、国家风险排名、争端解决等因素的交织

之下受到了束缚，这明显缩小了他们的发展空间。从全球正义的角度来看，这些规则所交织出的网络的运作方式并不对等。我们可以从拉丁美洲国家出口原材料的价格显著低于进口加工商品的支付价格一事中，再次看到[全球政治经济中，不平等的交换和权力的失衡](#)。如今，帝国主义不仅佔有了廉价的未加工原材料，还掌握在80年代成为世界工厂的某些南方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和加工商品：在全球商品链中，北方企业利用垄断的力量压低南方供应商的价格，同时尽可能拉高成品价格，这些都使得[全球北方依然能够以低廉的成本佔有这些工业劳动力](#)。

因此，仅仅减少全球北方的物质和能源流量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足以使南方国家得以繁荣。如果不触及不对等的全球经济结构，南方实现内生性和主权改革的实际「空间创造」不会发生。如果仅仅减少对原材料的需求而不触及不对等的全球经济结构，这可能甚至会导致某些南方国家的灾难性衰退，而这正是逆成长支持者想要竭力避免的。

> 反对绿色成长的

去殖民全球化全球联盟之必要性

以绿色成长为核心的霸权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并未开启可持续和全球正义的生态社会转型途径，反而导致全球南方地区的开采压力大增。它们的优先事项包括：一、为可再生能源的新工业革命提供足够的「战略矿产」；二、「能源安全」；以及三、为全球北方创造良好的脱碳记录。

这不是真正的能源「转型」，而是整体[能源扩张](#)的结果——成为经济成长的新驱力。乌克兰战争的地缘政治局势——包括对化石燃料的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扩张。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研究显示，这种以技术为基础、由企业主导的推动绿色成长的过程，实际上带来了多重新的环境不正义和[绿色殖民主义](#)问题。

霸權主義的綠色成長政策賦予了全球南方地區四種角色，每一種角色都包含強烈的帝國挪用的色彩：一、供主要大國脫碳的重要原物料儲備；二、通過碳抵銷「中和」北方（包含中國）的碳排放，藉此達到「淨零排放」的目標——這不應該跟歐洲、美國、或中國的實際零碳排混淆；三、成為北方的垃圾場，包括可再生技術和數字化的電子和有毒廢物；四、北方生態現代化經濟體生產並高價兜售新科技的潛在市場。

逆成长在全球环境治理和公正生态社会转型的讨论中，主要贡献之一是公开质疑绿色成长，这让逆

>>

成长成为边缘行动者的潜在盟友。但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在逆成长学者和逆成长运动积极参与在解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时。

我「并非」是要指出全球南方应该普遍施行逆成长，即缩减所有活动。相反的，考虑到过往历史责任、殖民债以及环境债务，全球北方应该在面对生态崩溃时，负起决大部分的责任，减少物质和能源流量。然而，不追求经济成长并以地球生命为主要考量，才能够在全球——无论南北方——减少有害的生产和再生产。

以全球南方为例，这意味着要减少开发主义，因为其以成长的名义让许多社会群体陷入贫困，同时它也阻碍了自主经济政策的施行。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北方少数质疑绿色成长逻辑，并主张结构性改革的声音之一，逆成长注定会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研究和政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前提是它必须与全球南方的运动展开真正的对话，超越普同的概念，并参与到现有不对等国际关系的结构变革战略中。■

来信寄至：

Miriam Lang

<miriam.lang@uasb.edu.ec>

*本文章经删减：Lang, M. (2024) “Degrowth, global asymmetries and ecosocial justice: decolonial perspectives from Latin Ame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doi.org/10.1017/S0260210524000147>.

> 女性主义去成长与生态社会转型

Bengi Akbulut, Concordia University, 加拿大

这篇文章将去成长定位为一种反霸权的提议，它扰乱并超越了主流转型的理解。强调去成长的理解是重新聚焦和重新定位经济（而不仅仅是生物物理的缩减），我界定了三个基本的潜力轴线：（a）突出更广泛的工作概念；（b）正义，特别是关于全球南北之间历史和持续不公正的正义问题；以及（c）自治和民主作为减长经济的组织原则。

> 扩展我们对「工作」的概念

第一个轴心是扩展对「工作」的概念，不仅仅是商品生产的雇佣劳动，还包括维持（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各种工作。女性主义思想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理论化这一领域的劳动，这些劳动虽然不属于但却支撑着商品生产，即社会再生产。社会再生产首先是再生产和维持劳工的工作；但它也涵盖了生命维持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生命和（商品）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条件的再生。因此，社会再生产不仅包括直接生产和维持人类生产能力的劳动形式，还包括[那些维持、调节和转变支撑生命的生物物理过程的劳动形式](#)

社会再生产特别独特之处在于它显著地具有性别化（和种族化），另一方面，它高度隐形化和贬值，即被编码为「非工作」。这绝非偶然：资本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不仅隐藏了这一工作和生产领域，而且根本上依赖于其贬值：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劳动者生产、维持他们的生计以及更广泛的生态—社会生产条件，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再生产](#)至关重要。[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指出了贬值和隐形的价值流动的规模，并将其与殖民、自然支配和女性屈从相提并论。因此，社会再生产是全球性的，包括殖民地、原住民和自给自足生产者的工作，他们再生产全球劳动力并保护/再生自然代谢循环。再加上全球社会再生产劳动的分工，种族化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如外籍看护工）有助于降低维持和再生产资本积累的成本，特别是在全球北方国家。

将工作概念扩展到更广泛的范畴，首先必须认知到这一被隐形的劳动和生产领域，并对其进行奖励

和支持。为此，可以采取的行动包括实施照护收入，扩大基础工人权益和权利，以及增加对社会和生态再生产的公共投资。这样的政策不仅能为社会再生产的工人提供物质支持，还可能在改变对工作价值认识和评估的观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认可和验证对于这种特点的彰显来说是不够的。仅仅认可和验证社会再生产，而不对其组织形式进行问题化，这样的风险在于继续巩固其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分布。较小的社会新陈代谢和物质及能源使用的缩减带来了重要问题，例如哪些活动将更多地依赖人力劳动，谁的劳动将替代例如家庭生产、农业或运输中的能源使用减少。正如[女性主义去成长](#)倡议者所指出的那样，考虑到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工模式，这种结构转变若不确保性别正义，可能会导致社会再生产的再女性化风险。

重要的是，女性主义的思考与政治不仅在推动认可和奖励社会再生产工作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它们还问题化了这种再生产工作的组织方式，即谁来执行、多少量、在什么条件下以及由谁控制，是否应该给予报酬以及如何决定其分配。事实上，对于女性主义政治而言，使社会再生产工作可见并将其揭示为工作不仅是为了此结果本身，而是为了改变其（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分配及其执行条件的斗争手段。这是一个关键的洞察力，因为它扩展了将更广泛的工作概念置于如何组织社会再生产的问题上。虽然几乎没有标准答案，[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应对这一问题的工具，指出合作和平等形式的供给，其中劳动是集体的并按照性别正义组织的。

总结来说，去成长对更广泛的工作观念所彰显的是对社会再生产劳动的认可和奖励，这对于维持（人类和非人类）生命至关重要，也是其集体、平等和民主组织的愿景。这种特点的彰显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观察角度，用于思考过渡式的正义，因为它不仅赋予了过渡概念，还赋予了正义概念，这些概念涵盖了支撑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多样而庞大的劳动和生产领域。换言之，过渡式的正义需要针对社会再生产的（人类和非人类）工作者的正义。

「资本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不只是隐藏了其背后的劳动与生产，且它的根本更是建立在贬低劳动与生产的价值。」

> 去成长作为/透过正义

第二个基本轴心是正义。去成长以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成为一个正义的计画。首先，正义要求设置界限，因为成长的社会和生态成本在各个社会和地理范围内始终不平等地分担着。能源和资源使用的缩减是一个正义的计画。这对于全球南北关系尤其重要，因为全球北方的经济增长一直在推动，并且持续推动对南方造成严重的社会生态影响。因此，[去成长是全球北方的责任，为其他人留下更多生活的空间](#)。

第二，更重要的是，成长是由全球不正义所驱动和支持的。全球南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历史上形成并持续再生产，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基础。它在北方和南方国家之间形成了不同的位置，前者的繁荣和成长基本上依赖于从后者那里便宜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流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使得全球北方国家富裕，同时将全球南方国家推向了被迫不断成长的道路，例如透过对开发主义的结构依赖、债务偿还或结构性调整。

因此，修复历史和持续存在的不正义对去成长极为重要，并赋予其关键的国际面向。虽然去成长主要是在为和全球北方核心工业国家制定的提议，其相关政策和行动通常被设想为对这些经济体内的干预，但「去成长责任」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全球北方的地理范围。去成长作为正义必然是一个项目，旨在一方面解决经济增长的历史和当代影响，另一方面解决全球经济系统中促进成长的结构。

这种[重新定义去成长与正义之间的联系](#)，在最近的去成长思想和行动主义中确实是其中的核心论述，特别是围绕生态债务和生态不平等交换的概念，即历史上和当代对生态资源和沉积物的过度使用或不成比例使用，以及透过国际贸易交易的货物中体现的自然不平等流动。然而，这需要与社会再生产的全球视角相结合，将这种正义观念扩展到包括全球南北之间维持生命的不平等劳动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是（具体化的）自然流动，无论是透过直接使用和挪用还是全球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更广泛地说，是维持和再生产资本主义增长的社会再生产劳动流动。因此，针对修复全球不公正的行动应考虑更广泛的「社

会再生产债务」概念，其中包括从全球南方流向北方的被种族化和廉价化的社会再生产劳动，以及殖民赔偿和归还土地给其合法的原住民监管者。

基于对去成长作为/透过正义的这一理解，所产生的具体行动和干预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向，这与《未来是去成长：超越资本主义之世界的行动指南》一书中关于债务章节中提出的建议高度一致。第一个方向涉及修复历史和当代的不公正，包括措施如偿还生态和更广泛的社会再生产债务、气候和殖民地赔偿，以及对全球金融和贸易系统的干预，以扭转/减缓全球南北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去成长不仅加入了呼吁赔偿和原住民主权的当代运动，如[土地归还运动](#)外，还加入了那些振兴南方人民生态债务债权联盟的转型潜力，这些联盟重新定义了所谓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将其视为全球北方应该偿还的债务。

第二组行动/干预与在工业化国家实施去成长所带来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萎缩可能对[全球南方](#)的潜在伤害有关，特别是对那些结构上依赖出口或外国投资的国家。由于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和劳动流动的不平等性质，历史上也塑造了许多南方经济在结构上依赖出口部门，因此在全球北方萎缩的情况下，后者将遭受损失，这相当于被迫解除联系。虽然上述以正义为导向的措施将提供一些纾困，但也需要直接的措施，例如转移资源进行经济重组。

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提议是关于开放和加强全球南方在选择非增长路径时的空间。这意味着一方面承认来自全球南方的各种运动、提议和世界观（例如后开发主义、Ubuntu、Buen Vivir）超越成长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透过资助与增长脱钩的合作/公共供应系统或支持远离不平等交换关系依赖的转变，来减轻全球南方内在的增长迫切需求。

> 去成长作为自治/民主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轴心是自治和民主。这与去成长呼吁退出被增长命令主导的社会想像有关，并强调在塑造经济过程中突出民主决策的重要性。与此呼吁相对应的是去成长对自治的重视。去成长深受Ivan

Illich、André Gorz和Cornelius Castoriadis等思想家对自治（及相关的民主）的概念启发。尽管这些思想家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理解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如何破坏自我治理能力，无论是透过经济决策集中化和官僚化，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侵蚀了自我定义需求的能力。即便在生理上是可能，但无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损害集体自我治理的能力。

因此，民主化经济决策以扩大自我治理，即使所有人都能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这是退成长的内在特性。首先，这体现在退成长对集体和民主决定具体需求和限制的坚持上，即哪些活动应该废除，哪些活动应该限制，哪些活动应该在退成长的未来得到支持和扩展。这也与去成长强调「不同，不仅仅是减少」相呼应，即呼吁构建一种不同于建立在剥削、积累和增长基础上的经济，转而以需求、供应、公平和团结为中心的经济。因此，遏制企业权力，建立对金钱和金融的民主监督，公共参与式预算，生产能力的民主治理以及构建和加强替代（非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是去成长的基本面向。

透过这些干预和实践进行各层面的经济决策民主化，有潜力突出具体需求、使用价值和**非货币财富**，而不是累积、利润最大化和增长，并优先考虑确保可持续和公平的生计或环境质量的再生、更新和

保护等原则。将经济决策过程开放给更广泛的参与者进行民主参与，将使更广泛的需求和价值得以纳入，以指导关于例如在何种条件下、如何生产、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如何设置价格或工资以及在哪里投资剩余资金等决策。这将为重新思考经济增长或效率等经济必然性开闢空间，使替代性目标能够实施，并透过使经济理性受到社会讨论和控制来（重新）政治化经济。

民主和自治在经济领域内不仅是值得追求的原则，它们还可以作为抑制和转变资本主义增长经济中社会和生态破坏性动力的力量。在主流的生态社会转型辩论背景下，去成长对经济民主和自治的强调特别关键。这些辩论通常集中于对经济活动进行结构性重新定位，例如远离以石油燃料为基础部门，通常伴随着使用生态效率技术。它们将转型问题简化为如何正确投资的问题，即远离生态破坏性活动，并纠正生产能力错误配置的问题。然而，这些辩论中缺少的是对经济过程如何治理以及需要哪些种类的经济机构的愿景。这正是去成长对自治/民主强调至关重要的地方，因为它使转型的辩论不仅涉及经济决策的结果，还问题化了这些经济决策过程本身。■

來信寄至：

Bengi Akbulut

<bengi.akbulut@gmail.com>

> 如何建立 公正且受欢迎的能源转型？

Tatiana Roa Avendaño，领土环境规划副部长，哥伦比亚，和 Pablo Bertinat, Taller Ecologista，阿根廷

出處：Angie Vanessita
(angievanessita.wordpress.com)



从社会环境正义的角度来看，在普遍环境主义的范围内，我们主张建立一个基于反资本主义和社会生态学叙事的公正且受欢迎的能源转型。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必须对当前情况进行诊断，并确立通往预期未来的道路。在这方面，重要的是了解解决与能源相关的问题所需改变的规模。这意味着不仅要考虑温室气体排放，还要考虑各地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环境影响，以及与能源相关的冲突，还有能源控制权集中在少数人与大型企业手中的情况。

我们将能源系统理解为一套将我们作为社会和我们的社会—自然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正且受欢迎的能源转型需要去商品化、民主化、去燃料化、去集中化、去中心化和去父权化。但是，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哪些行动和过程呢？

> 去商品化和民主化之路

公正且受欢迎的能源转型基于一个前提：所有人

>>

都有拥有能源的权利，同时挑战能源是商品的观念。这是关于取消私有化，并加强各种形式的公共性、参与性和民主性。这里头的其中一个口号是去商品化，意味着将能源从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商业逻辑中解放出来，转而集中于控制和再生生活的能力，涵盖其所有物质上和象征性的层面。

当我们将能源视为共有资源的一部分，它是与自然权利一致的集体权利，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将能源视为一种权利的愿景。以水资源权利的争取为例，这个权利不仅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所有生物。我们将自然及其所有物种纳入这个定义中，因为我们认知到人类生活也充分享受了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当前资本主义体系的框架内，市场是服务于那些基于无限资本积累理念部门的工具，超越了生命物理上的极限。去商品化的概念挑战了资本主义市场在解决某些需求上的中心地位。恢复公共性对于这条路径至关重要。这不仅意味着从私人手中收回所有权的论辩，还涉及管理问题。在我们的观点中，恢复公共性不应仅仅与州（国家）相关联。这是关于加强和重建所有形式的公共性，无论是在所有权还是管理方面，包括与社区、公共、市政、合作和协同领域相关的历史经验。这些在私有公司提供的服务中所谓的卓越效率面前都是宝贵的工具，必须加以强化。

去商品化和社会建构能源权利意味着，除了其他任务外，还需进行广泛的立法、监管和规范改革，废除将私有部门放置在能源系统中心的私有化法律和市场自由化。同时，推进去私有化进程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能源公司，还包括其他基本服务，并发展加强所有形式的公共性在所有权和管理方面的工具，特别强调不同层次和领域（合作、社区、州和国家）。加强必要的制度框架以实现这一目标是极为重要的。

作为推进能源部门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是，建立必要资讯透明机制，使任何社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能参与决策。为此，重要的是检讨、修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逆转对石油燃料和石油能源经济各个部门的直接补贴政策。同时，承认并支持在资本主义市场之外参与能源生成、分配、管理和消费的机构和行为者也至关重要。

此外，更重要的是承认在地方层面上能够决定能源的可能性，包括能源的各个层面（生成、消费、能源贫穷等）。市政能源机构以及重新争取公共服务的经验都是可以加强的例子。为了使这一过程更加动态，还需要在方法上不断推进：开发工具和程序，建立地方、社区和市政能源政策，作为对这些政策的集体持有形式。

> 这不仅仅是减碳的问题

碳汇是吸收温室气体排放的机制，而材料和矿物资源的有限可用性则限制了在当前生产和消费模式下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石油燃料的能力。这意味着减少净能源使用是主要目标，虽然这种减少必须计划和执行，同时考虑到平衡现有的不平等和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的需求。

同时，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仅仅在可再生能源使用上取得进展是不够的。相反，有必要考虑每个具体计画的环境、社会和政治层面，以确定其永续性。

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行动中，有以下几点特别突出：

- 同意不在风险高的区域（如离岸区域）开发非常规和常规碳氢化合物，或在短期内放弃石油燃料的框架内减少其使用；
- 监测净能源使用的实际下降情况，超越原来所做的气候承诺；
- 对不同行业提出具体的建议，例如在拉丁美洲，交通运输是主要的能源消费者，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能源部门；
- 发展视觉化工具凸显能源效率的社会经济效益，并建立与商业逻辑相悖的监管变革；
- 停止采用仅限大型商业/跨国供应商之间的可再生能源竞标流程作为唯一选择，并优先考虑分散这些源头和去中心化的发展。

> 关于生产模式和消费

为了朝著公正且受欢迎的能源转型迈进，有必要建立一个符合生命永续性和生态系统及循环保护的生产模式。正如女性主义者所提议的，将生命置于这一模式的中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提倡的能源转型需要承认自然和人类在物理上的限制，以及[关联性和相互作用作为生命存在固有特微的内涵与重要性](#)。这些观念与在社会中组织生活的新方式、生产形式的新型态、重新评价社会中生产和再生产工作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与社会—自然代谢变革相关的新消费形式相关联。

无论各个部门与能源效率相关的倡议如何，必须在行业分析上取得进展，以质疑区域生产和运输模式，并寻求永续和公平的替代方案。在这方面的具体建议包括，例如：

- 建立商品流通的最大循环，发展优先考虑本地产品的微生产链；
- 分析需要减产的物质，确定停止生产哪些产品；分

析如何提升服务比商品物质更为重要。必须依照建立的去成长时间表；

- 发展新的生产领域和能源消耗较少的服务；
- 确立停止使用个人内燃引擎车辆的时间表；
- 实施货物运输方式模式转变的过程；
- 重新思考基础设施的角色和设计，因为它用公共资金资助的，并决定未来的行为和消费。

同样地，这个必经的过程，使我们能够在社会建构中满足人类需求的其他形式上取得进展。这是一个密集且广泛的进程，但可以透过使用各种工具来加快这个过程，例如：加强城市永续消费的网络；制定禁止产品设计守旧的法规；对产品进行大规模的生命周期分析；禁止或限制特定类别产品的广告；建立快速计划来消除能源贫穷；将能源政策与居住政策联系起来；限制浪费能源的使用方式。■

来信寄至：

Tatiana Roa <troaa@censat.org>

Pablo Bertinat <pablobertinat@gmail.com>

Twitter: [@tatianaroad](https://twitter.com/tatianaroad) 和 [@PactoSur](https://twitter.com/PactoSur)

> (泛) 非洲 生态女性主义运动

Zo Randriamaro, Research and Support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 Indian Ocean, 马达加斯加



Freepik / Arbu 改编

非洲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位于三种不同运动——包含主要由气候正义行动主义者所支持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由去殖民主义者所推动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由女性主义者为代表的反父权运动——的交汇处，对抗扰乱、破坏原民文化与制度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体制。因此，[非洲生态女性主义者](#)正努力在拆解压迫、剥削女性与自然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制度。

> 促进气候正义的泛非洲女性主义运动

在社区层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非洲大陆的大型农产业和开发工程，及其与企业和国家权力的联系，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适应能力所造成的威胁。生态女性主义与草根的具体抗争和倡议密不可分，这些抗争和倡议是借由允许一个社会在不破坏

其他社会或生物物种的情况下自我繁殖的物质和文化历程，来保护、发展或修复可居住空间和社会纽带。

随着受到影响的群众越来越意识到霸权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将破坏生态平衡，气候正义运动逐渐受到各界关注。而我们应该从女性主义的观点出发，关注这个将目光聚焦于生态危机及其根源的气候正义运动。这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在于，关注非洲的气候和生态危机，以及它们与开发式发展的连结，还有其在性别上的影响，并要求「废除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保护地球，并为历史上侵犯人民和自然权利的行为做出补偿」，正如[Margaret Mapondera、Trusha Reddy 与 Samantha Hargreaves 等人的建议](#)。

>>

由于其跨国性质，气候正义运动和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不能仅局限于零散的方法，而需要泛非的行动方针。非洲大陆的分裂和意识形态分歧很大程度地促进了非洲不同形式的殖民主义的延续，这意味着泛非主义是非洲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拥护的去殖民化进程的关键支柱。

> 非洲生态女性主义与去殖民化

[Wangari Maathai](#) 表示，「殖民主义是自然环境恶化的开始，原因在于工业化和自然资源的开采[...]砍伐森林、种植破坏生态系统的进口树木、狩猎野生动物和商业农业都是破坏非洲环境的殖民活动」。因此，从一开始，非洲生态女性主义就成为推动非洲系统性变革的去殖民女性主义方法的重要支柱。

在这方面，非洲生态女性主义者也一直依靠其丰富的传统遗产和原民文化来挑战父权和新殖民主义。某些非洲女性主义者——如 Fainos Manguena——认为非洲文化传统和社群主义哲学与女性主义并不兼容，因为它们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而其他生态女性主义者——如 Sylvia Tamale 和 Munamoto Chemhuru——则肯定非洲传统哲学和工具，如 Ubuntu，可以用来实现性别正义以及非洲女性主义的其他目标。

乌干达学者与人权行动者 [Sylvia Tamale](#) 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潜在特征与非西方原民文化传统上的做法非常相似」。特别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可以从「原住民与自然之间的认识论关系中汲取很多东西，这种关系通过他们的灵性、部族图腾、禁忌、祖先神话、仪式、寓言等等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违反禁忌的后果不仅局限于个体，遵守禁忌的责任是公社主义的。如果你违反了社会禁忌，你的亲戚也将受到影响」(页87-89)。

在下文中，由马达加斯加西北部萨卡提亚岛原住民群体中，守护当地圣地和生物文化遗产 (Mpijoro tany) 的妇女的发言，就是这种认识论关系的典型例证：

「我们作为『Mpijoro tany』的职责，是对我们祖先所建立的村庄负责。这里有一个叫 Ankatafabe 的圣地，在 Ampijoroa 和 Ankofiamena 也各有一个圣地。过去没有教堂，但这些地方是我们向上帝祈祷的地方，如同在教堂里一样。我们的祖先严格遵守『fadin-tany』(土地禁忌)，现在 Sakatia 的大多数人仍然遵守这些禁忌。如果一个人触犯了『fady』(禁忌)，他必须杀死一头瘤牛来补偿他所犯下的过错。」(Justine

Hamba, 仪式祈祷领袖, 2021 年)。

Sakatia 岛圣地的另一位守护者解释了传统仪式和习俗背后的理由，以及遵守这些仪式和习俗，是为了守护共同利益、确保社区团结、合作、友爱和信任，以及在生者和死者之间建立尊重：

「有一种为食用者保存『kodry』(鱼)的方法。你只捕捞需要的数量，多馀的必须分给社区，不能扔掉或卖掉。这就是社区意识和爱。蒐集食物的人不一定是吃食物的人；食物必须与社区共享。不能出售或大量蒐集食物，否则食物会因此灭绝，环境也将因此受到伤害 [...] 不能无故捕杀村子里的小动物，例如『Anjava』，它是一种生活在阴凉处的小动物。它藏身的绿色森林不应该被砍伐。如果一个人杀死了这种动物，那么他/她就会遭遇不测。除非他/她接受惩罚 (manala fady) 并向村里的传统祈祷领袖道歉，否则诅咒不会消失 [...] 触犯禁忌的人犯了亵渎罪；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珍视的土地上的宝藏，这些动物应该永远受到尊重并留在村里[.....]禁止破坏提供我们生活所需的雨水和新鲜空气的森林。这是为什么 Sakatia 岛是一座绿色岛屿，因为我们不砍伐山上的森林，并且我们还植树造林。我们也保护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生物，防止渔民使用非标准渔网捕鱼。我们保护海龟以及『Horoko』和『kodry』等特有鱼类[...] 我们在村里有一个『dina』(具有制裁制度的传统社会习俗)：例如，如果你说脏话或粗话，『dina』中会有相应的惩罚——你必须去找仪式祈祷者道歉，否则村子里的每个人都会受到诅咒。」(Célestine, 仪式祈祷领袖, 2021 年)

如上所述，Sakatia 的马达加斯加社区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众多原住民群体一样，遵守着「[自然关系伦理](#)」，这些群体也担心以人类为中心的干预会破坏健康的生命网路，威胁地球的生存。正如 Sylvia Tamale 在其《[去殖民化与非洲女性主义](#)》一书中精准强调的那样，「全球南方的妇女可能没有自我认同为『生态女性主义者』，但她们有着悠久的生态意识和对后代的道德义务」。

> 非洲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发展的替代方案

从去殖民化、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微观和中观层面上已经存在许多丰富的替代方案。其中许多替代方案来自非洲，如团结经济、集体解决劳力和种子、货币等资源的办法，这些方案必须得到认可并发扬光大。正如拉丁美洲的其他提案采纳了原住民的一些立场和宇宙观，包括自然权利和「Buen Vivir」世界观 (西班牙语，指基于社会和

>>

生态扩展愿景的美好生活)一样,非洲肯定有大量的内生思想、实践和政治概念,这些思想、实践和概念存在于传统、反殖民斗争和后殖民变革中,我们应从中汲取灵感和指导。其中包括原民知识体系、社区使用权/原住民族土地权和社会劳动合作。

其中最主要的是以非洲世界观和哲学为基础的批判性替代方案,在南部非洲被称为 [Ubuntu](#),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并「[尽可能削弱传统的父权制、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生存观](#)」。由于 Ubuntu,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人一直在颂扬将过去和现在以及人类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念。

作为一种非洲伦理范式,Ubuntu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格格不入。相反,面对 Vishwas Satgar 所说的「帝国生态灭绝」,Ubuntu 强调的是一种团结和去殖民化的行动主义。Ubuntu 的生态伦理产生了「后开发主义的激进概念,即为子孙后代留下推动破坏性资本主义积累及其危机——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化石燃料和矿物」。

从一位非洲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

「Ubuntu 环境伦理旨在强调,必须以关爱、敬畏和善意的态度对待传统上被认为在道德上无足轻重的自然界的各个面向——如非人类生物——并给予它们伦理上的考量。同时,Ubuntu 中的这种生态女性主义层面意味着,从 Ubuntu 美德中产生的类似价值观——如关爱、善意和敬畏——也可以赋予或归因于自然界的非生命方面,如不一定有知觉的自然界、植物和水体。」

非洲农村妇女和原民妇女为捍卫自己的领地、自主权、生产方式、社区关系以及关系着他们生存的,与大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提出了生活中的替代方案,并反对极其破坏的开发主义模型。这样的生活中的替代方案,显现在人们生产、交

换、照顾和再生自然资源的方式,培育家庭和社区的方式,社区合作的方式等方面。正如 WoMin 所说,「非洲的大多数妇女肩负着气候和生态危机的重担,但自相矛盾的是,她们并非造成这些危机的人。她们正在以其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抵制开发主义父权制,实践并提出一种发展替代方案,如果我们和地球要生存下去,全人类都必须尊重和响应这一方案」。

具体来说,非洲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的一系列内容包括:建立在 Ubuntu 哲学基础上的、以各国人民集体团结和共享为中心的、面向不同未来的公正和可持续的替代方案,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首先,他们将借由农业生态低投入农业模式落实粮食主权。他们将通过「全球南部妇女承诺」的概念,保障人民有迈向幸福的权利,这样的概念为地方层级的生活发展替代方案提供了可信度和空间。同时,这些替代方案必须以能源主权为目标,通过可持续和分散的集体形式,在社区,特别是妇女的控制下生产可再生能源,并停止开采和燃烧任何化石燃料。他们还是允许小规模、低影响的开采形式,但需以集体所有制的形式进行,并需服从当地和地区的优先事项。在治理模式方面,他们必须在各级决策中提出参与性、包容性的民主,承认妇女在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与不同的需求,并需要得到受影响社区——特别是妇女——充分和持续的同意。

这些替代方案也将挑战私有财产的首要地位,尊重并支持由集体和团体「拥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制度,积极扩大共同财产,以此作为反对私有化和金融化的关键部分。它们还将促进、加强传统的全球北方和南方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经济增长,快速转型为低消费的生活方式。■

来信寄至:

Zo Randriamaro

[<randriamarozo@gmail.com>](mailto:randriamarozo@gmail.com)

> 瓜地马拉

民主进程的关键106日

Ana Silvia Monzón，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瓜地马拉



「瓜地马拉值得迎来新春」出处：Carlos Choc

过去，瓜地马拉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军事统治和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失踪与被拘留。在2023年，瓜地马拉经历了自1985年恢复民主政治以来最复杂的选举之一，在此之前，共有二十二名总统候选人获得提名，保守的 UNE 党和进步的 Semilla 党将各自的候选人推进到第二轮选举。有鉴于 Semilla 党成立时间不长，而且在民意调查中并未名列前茅，该党的成功令人惊讶。六月二十五日第一轮选举结束后，随着第二轮选举将于八月二十日举行的消息宣布，右翼部门开始针对精英和国家军队中最顽固的部门的利益做出一致的回应。

>>

他们对 Semilla 党总统候选人 Bernardo Arévalo 和 Karin Herrera 采取法律相关的攻击策略，而这也显示出司法机构已被他们收买。根据一项未经查核的投诉、一项不充分的调查以及一名法官的偏袒行为（他采用的是刑法标准而非选举法），媒体开始编造选举舞弊的故事。有人要求暂停 Semilla 党的活动。尽管遭到有力的抨击，Semilla 党还是在第二轮选举中毫无争议地赢得了 58% 的选票：这显示出公民渴望变革，厌倦违法、掏空国库和破坏民主的贪腐和贿赂。

> 「新的春天」与随之而来的政变

市民们在街头上高喊着对于「新的春天」的期盼，这个口号暗指 1944 年的革命，也就是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独裁统治之后，成为国家政治史上重要分水岭的一场革命。此外，那场民主的春天是由现任总统的父亲、Semilla 党领导人，同时也是社会学家的 Juan José Arévalo Bermejo 博士所领导的。许多人认为这个巧合是一个好预兆，预示着在经历过去十年腐败的体制与打压异己后，这个国家迫切需要转型。

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参与了针对 Semilla 党的司法迫害，因此当最高选举法庭宣布正式选举结果，宣告最终获胜的总统候选人时，宪法法庭与最高法院的压力骤增。作为司法迫害的一部分，2023 年 9 月，职责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突袭了最高选举法庭总部，检察官办公室人员在没有明确目的的情况下搬走了几个装有公民选票的箱子，这样史无前例的行为侵犯了人民普选的权利。

这次事件让公民纷纷站出来，要求总检察长及其团队为他们在这些案件中，对陈抗与批评政府者所进行刑事骚扰一事负责，引咎辞职。当时已有约一百名记者、法官、检察官和行动者因行使其陈抗与批评政府的权利而流亡海外。还有一些政治犯，如律师、前反贪腐检察官 Virginia Laparra 和记者 José Rubén Zamora，在其案件没有足够依据的情况下被审前拘留了一年多。

此外，2023 年 11 月 16 日，检察官办公室在被称作「占领瓜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Toma de la USAC）的行动中逮捕并起诉了五名大学生和一名青年行动者。这次占领行动是为了抗议 2022 到 2026 年新校长的选举，借此行使捍卫这唯一一所国立大学自主权的权利。在这起案件中，检察院试图构陷现任副校长 Karin Herrera 与大学占领者为同夥。可以看出，「政变协议」一直在不遗余力地

使 Semilla 政权失去合法性和有效性。

> 由人民捍卫的民主

2023 年 10 月 2 日，一般不参与国家政治的瓜地马拉四十八个行政区（起源于 Totonicapán 市 K'iche' 人相关历史的社群政治系统）当局公开要求总检察长、两名调查检察官，以及一名负责 Semilla 党的法律诉讼并且为侵害民意背书的法官辞职。

面对拒绝服从的态度，四十八个行政区的当局开始了和平游行，游行队伍跋涉两百公里来到首都检察院，呼吁其他城镇的社会运动和当局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的论点包含：检察官支持的司法体制无视具有宪法地位的《选举法》，削弱了民主的基础；人民的抑制被漠视；这场抗争不只关于 Semilla 党。

这是近几十年来瓜地马拉社会动员的一大进展。在该国最近一次重要的公民运动，即 2015 年的反政府高层贪腐的运动中，动员仅限于首都。如今，在不同地区的原民当局的带领下，四十八个行政区率先发起行动，其中包括 Sololá、Xiles、Kaqchiqueles、Q'eqchi' s、Chortíes 和 Xincas 等地的当局，此外还有首都的某些地区。

从 2023 年 10 月的第一周起，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在多达八十多个不同地点封锁道路，支持原民当局，组织规模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轮班在检察院外维持秩序，每天为三百至四百人提供食物和必要资源。这项任务主要由妇女负责，她们在人们滞留首都的一百多天里负责管理「团结厨房」。

在美国的移民者也对这个行动贡献良多，他们每周在美国多个城市的瓜地马拉领事馆前借由捐款和政治行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加拿大和欧洲也是如此。社交网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社区团体、宗教团体、学生、非正规摊贩和普通工人的领导下，城市中的封锁行动成倍增加，他们发起许多有创意的活动，如街头舞蹈和瑜伽课程、彩券游戏、自发音乐会和街头宣讲。除了政治抗议行动外，这些行动也试图在这个因交通、服务和公共安全匮乏而窒息的城市中夺回公共空间。

检察官办公室前的街道成为了一个民主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公开批评、分析、举行 Mayan 仪式、宗教仪式、玩游戏、唱歌、跳舞以及用所有原住民语发表演讲。在这个临时搭建的营地里并发

>>>

出各种想法和建议，妇女、老人和年轻人各抒己见，聚精会神地关注着所谓的「政变策划者协议」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其中包括总检察长办公室、串通一气的法官和治安法官以及总统本人及其内阁。

尽管卧底企图与警察发生冲突，但抗议行动很和平。在一百零六天的抗议行动中，只有一次武装人员在该国南部的 San Marcos 高速公路上发动袭击，造成一死两伤。

在此期间，其他重要行动者包括美洲国家组织（OAS）、美国政府和欧盟。这些组织都借由个别代表团跟进选举进程，他们报导了两次投票的透明度以及两名候选人的当选合法合规。美洲国家组织发表声明，对「Semilla 党」所受到的迫害、无数难以理解且不成比例的司法程序，以及侵犯选民权利的行为表示关切。

从 8 月 20 日投票到 2024 年 1 月 15 日 Bernardo Arévalo 就职的漫长时间里，瓜地马拉的局势成为几次特别会议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调解团讨论的主题。值得强调的是，该特派团主持并建立了一个对话平台，使原民当局和共和国政府得以平等地对话。虽然对话没有取得原民所期望的结果，但这个平台给予了原民当局领导与公民诉求重要的支持。

瓜地马拉民主这关键的一百零六天是在不确定、渴望变革和体制脆弱的情况下度过的。在新一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当权者的攻击使得公民一直处于焦虑当中。尽管有人试图阻止新的春天到来，但是，我们度过的这——

一百零六天，足够
重新编织
记忆与血肉
以所有语言
唤起尊严
以权利的形状，再次
十取喜悦。
人民的灵魂
不再沉眠，愿意将肉身
掷上街头、投向
历史的一面
裂纹里映出了
那些潜藏的声音
一百零六天，足够
使心底浮起正义
再不动摇 ■

来信寄至：

Ana Silvia Monzón <amonzon@flacso.edu.gt>

Twitter: [@AnaSilviaMonzo1](https://twitter.com/AnaSilviaMonzo1)

> 智利修宪程序失败后的社会运动

Carmen Gemita Oyarzo Vidal,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Chile, 智利



「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智利诞生和消亡。」出处：Moisés Palmero

2019年10月，智利迎来了其当代历史中最盛大的一次动员。当地的社会学家们对这次的抗争提出了许多评价，其中有三个应该被强调的主要论点。第一种观点，也是颇为普遍的一种说法，认为2019年的暴动象征着前一阶段针对归还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动员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终点）。上一场抗争源于2011年的学生运动，当初的诉求只能透过建立新的民主秩序被满足。第二种诠释指涉了[抗争的自主化](#)，描述社会动员和工会或政党等政治机构行动者之间的距离。在智利的案例中，2021年的制宪会议最大化的体现了政治机构与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第三种论点认为，智利社会在2019到2021年间经历的政治化过程是一矛盾和复杂现象，其源于新自由主义的日常经验悖论。这种情形一方面制造了个体和其行动能力的强化形象，另一方面却也产生了不正义和不公平的认知。[主观不适政治化](#)的论点可以解释智利

社会在想像一个替代新自由主义的集体计画时的困境。

> 2021年的修宪经验和2022年的挫败

智利在2019年末的大型抗争后，国内大部分的政党都同意执行公民谘询，以开启一个新的制宪程序。在2020年10月的公投，有超过78%的公民为启动制宪程序投下同意票，并由2021年5月选出的制宪会议负责执行。这是过去历史中被排除的社会团体（女性、原住民和不同社会运动团体的成员）首次进到赋予自身决定权和社会影响力的制度空间中，也是智利宪法第一次全面由民主选举的方式起草。

此民选宪政会议的组成特点在于有着明显的独立候选人，共佔了155席中的48席；但同时，呼吁

>>

重建民主秩序的进步力量出现了分裂。人们对制宪程序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对左派而言，他们将此视作2019年抗争的主要政治果实，并且也是重建国家和推翻由 Augusto Pinochet (1973-1989年) 独裁执政期间通过的1980年宪法的重大机会。

宪政辩论的氛围在讨论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和社会事务时变得紧张，包含了智利社会的同质性特征、领土的统一和国家的概念，期间也引入了奠基在团结之上的社会权利概念。

制宪会议的讨论结果于2022年7月时以一份新的智利宪法草案呈现，并需要透过两个月后的公投批准。草案的内容不仅承认并包含了历史上被边缘的群体，也带有生态和多元民族的观点。然而，在2022年9月4日，这场有超过85%人民参与的公投中，这也是智利历史上最多人参与的一次选举，宪法草案被62%的人投下反对票，而同意票只有38%。

> 挫败的情绪和原因

公投的结果让社运人士感到困惑。当开始回想公投结果出炉当下的冲击时，他们解释到，过去几个月内制宪会议工作的高强度状态，显然使成员们没有即时意识到宪法草案的内容对多数民众来说根本毫无意义。在激烈的制宪讨论结束后，这些致力于制宪会议的核心社运人士只有在造势时接收到来自一般民众对宪法草案的不满，但这时早已来不及再修改草案。意识到「人民」并没有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便是让他们感到最为难受的。然而，他们似乎拒绝面对现实；他们以为草案会成功通过，毕竟希望改革的声音是如此之多。

社运人士们为了这份草案所做出的牺牲，使他们在公投结束后感到十分痛苦。我访问的部分社运人士以服丧形容这次的挫败，他们认为公投的失败象征了社会改变的希望之死，有些人已为了这份改变抗争了几十年。在2019年盛大的动员后，他们曾一度相信现在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可以结束 Pinochet 的宪法和其带来的社会及政治不公。

另一方面，许多参与这个过程的社会人士认为他们好像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致力于修宪的社运人士的日常生活和他们所认为发生在「制宪会议之外」的事情之间似乎产生了隔阂。在不同社运人士的叙事中总带有一些牺牲的色彩：记忆中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过程、截止日前因为熬夜而永远缺乏睡眠的日子 and 无限延期的家庭和悠閒时间，这让他们觉得社会大众并没

有对他们在在这个过程中投注的精力予以相对应的回报。

在经历了公投结果带来的痛苦后，社运人士开始对选民的忘恩负义感到愤怒，他们本应是社会改革下新宪法的受益者。针对选民行为和社会大众拒绝宪法草案原因的分析也引发了社运人士间的紧张情绪。就在公投结果出炉后，最多疑的那一群人根本无法相信这场选举之灾；与此同时，那些极其失望的人则认为是人们的无知和右翼主导的资讯战导致了这样的公投结果；也有人怪罪自己做得不够多，没有成功说服更多人。无论如何，结果是明确的：针对修宪的公投，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赞成票多过于反对票。

在公投结束将近两年后，社运人士对他们的诉求和大众常识之间的落差有了更深层的反思。当他们回想起部分人以激情和怨恨来无视公众的选择时，他们相信无视或忽略选民们的理由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最重要的是，在我进行的团体访谈中，参与者一致认同如果那些声称自己代表多数的团体无视民众的诉求，是不可能建立起政治多数的。

纵使这些社运人士们仍为修宪的失败感到难过，他们现在意识到了不要理想化或轻视民众动机的重要性。并且如果要了解为什么部分政治诉求对民众来说不合理，或是为什么民众对发展特定领域的社会变革并不感兴趣，应该要考量到生活条件最为恶劣的人民，关注他们的物质需求。因此，了解为什么建立于团结之上的社会秩序会如此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当这群社运人士在讨论公投失败的其他原因时，他们也发现要协商彼此的道德和政治准则并不容易。在社会动员最高涨的那段时间，他们相信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并且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取代传统的政治行动者。2021年意料之外的选举胜利更使他们坚信与既有的党团协商是没有必要的。

社运团体认为修宪草案中部分内容的激进取向和对其进行修正的过程是推动国家改革的历史时刻。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切需求，并将所有事情进行妥善的整理和确认，避免议会在将来又背叛了这一切。然而，受访者也意识到，因为2021年选举的胜利，和对稳固多数地位渴望，使他们自己的组织也带有部分的傲慢和固执，而拒绝了去倾听或与其他人的意见进行协商。

再者，像2022年宪法草案中这类深度的社会和制度改革，若希望取得他人的支持，所需要的不仅

>>

仅是众人在特定议题中的让步，而是主流社会和政治中更进一步的共识。然而，即使这一阵子的社会运动促成了启动修宪过程的力量，却没有能力在智利形成足够的主流共识。

> 全盘皆输？潜在的紧张局势和地域变化

尽管参与制宪会议的社运团体已经形成了另类的政治团体（如Solidaridad para Chile），但一切迹象皆表明这些团体在争取代表席位和建立支持者基数方面都不太顺利。至今仍没有可行的方法解决当时制宪会议留下的政治分裂情形，社运团体对政党的不信任更使其无法顺利建立政治同盟。

地域似乎是在维持社运认同渴望中的最佳筹码。地域的多重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辨别社运团体在公投失败后要务为何，以及看清与其他行动者（包含左翼政党）间的合作和冲突关系。我们可以在现今的智利社运中辨识出至少三种相关的地域意义。第一，地域作为地理和社会生态空间，展现了广泛的环境意识，这种意识在社运界颇为广泛，并且不只存在于当前与环境组织一同行动或合作团体中。除此之外，它点出了智利地域多元化的重要性；住在不同地区的人民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经验。而小型社区相较于大型或空间、社会上被隔离的城市，更容易将自己视作一个有单一认同的集体。

地域另外可以被视作一种政治空间和所属团体的体现，使社运团体辨别出他们的支持对象和「地方深耕」的目标。作为社会政治空间，地域涵盖了

多样的人们和不同的日常共存形式，使组织团体可以从其中辨别自身所处的位置。从此观点来看，地域是一个充斥着意义性互动的空间，使社运人士可以定义自己，并被他人视作合宜的沟通对象。

最后，与马普切社群代表的合作揭示了地域的第三种意义。对于马普切社群而言，领土是他们生活的关键所在：包含了物质生活（土地和水源的取得）、政治生活（一套共存的准则）和精神生活。土地和河流是镶嵌在一起的，并且连结了社群和他们对祖先的回忆。所以，马普切人就是他们的领土，政治共存的空间就是他们的社群。社群作为主要的组织方式，是一个由政治权威（lonko）和精神权威（machi）主导共存的小型社区。

这些地域的不同意义对于了解智利社运团体在修宪失败后的政治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当社运团体的代表们被承认，并取代了草根或人民的分类时，社会运动便发生了。然而，这是一个由次文化团体或社区联合主导的有限政治空间，可能不足以形成影响公共议程的能力。但在政治的领域中，两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有必要去等待并观察这些运动在不同地域间的连结情形，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市政和议会选举产生的中介效果和影响。■

来信寄至：

Carmen Gemita Oyarzo Vidal

<carmen.oyarzo@uautonoma.cl>

> 对米雷伊政府 反抗的开始

Julián Rebón,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and CONICET, 阿根廷



| 出处：湧現，CC BY-NC 4.0.

外人。作为一个以其颠覆性风格闻名的时事评论家，他提出以美元化作为解决当前国家通货膨胀且经济不断衰退的问题。进入政坛的几年后，在没有自己的政党为其背书的情况下，他打败了两个交替执政且使国家两极化的政党联盟，分别是左翼的 *Unión por la Patria-peronismo* 和右翼的 *Juntos por el Cambio*。

虽然 *Libertad Avanza* (自由进步党) 在国会仅有少数席次，并且没有拿下任何一个省份，在如此有限的政治权力下，它仍大胆地提出要在经济层面实施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层面则实施极权主义。Milei 主要透过社群网路和媒体以激进的风格表示将视「阶级」为自己的敌人，然而，他实际在攻击的却是民粹裴隆主义、左派、女性主义、工会和社会运动。同时，他将多种背景的历史社会学家纳入自己的计画中，并在许多经济组织中获得了广泛支持。

> 反米雷伊抗争的出现

尽管政府对抗争采取了相关的限制政策，Milei 仍立即在落实改革后受到了来自街头的抵制。就上任后不久，政府提出了一项允许保安部队限制公共示威的条约，目前已开始实施的规范包含禁止公民行动常见的「封街」行为、向社会组织收取保安规费，并建立专门的匿名管道，供民众举报强迫人们参与示威行为的团体。在 Milei 任职几天后，政府更签署了必要性和急迫性法令 (DNU) 来放宽对经济的管制、废除多项法律并在劳动和居家、健康保险等多个领域推动改革。在落实这些变革后，各大城市纷纷出现游行和示威，凸显了强制实施反抗政策的困难。

在 2023年底，Javier Milei 就任阿根廷共和国的总统，声称自己是史上第一位自由主义派的元首。在他的就职演说上，他背对着国会和在场的议会成员向自己的支持者、喊话。他承诺会透过整治国家和「阶级」来结束阿根廷的衰败，「阶级」一词的意义并不明确，主要指涉了传统政治人物、工会领袖和公务人员等拥有特权的政治得利者。现场的民众则高声呼喊「no hay plata」(没有钱) 予以回应。

Milei 政府上任的前一百天，大规模地调整了过去的一切传统。然而，这些调整影响到的社会层面广泛且多样，而并非只针对所谓的「阶级」。Milei 口中为了创造财政剩余的「电锯」行动导致了成千上万的裁员、多家机构的倒闭、公共工程的停滞和福利津贴的取消。Milei 也实施了他称为「搅拌机」的休克疗法，导致阿根廷披索在一天内贬值了超过50%，并使通货膨胀翻倍。这造成退休人员 and 劳动人口的购买力大幅下降 (约30%)、披索存款的蒸发、存款的负利率和公共预算的锐减。

> Milei 是谁？

Javier Milei 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政治体系的局

>>

随后，政府向国会提出了一项包含超过六百条涉及多项议题条文的综合法案，其中包含了赋予总统高度权力、私有化和对抗争权的限制。正如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动盪，并引发不同形式的抗争。工会团体和社运团体在此起了领导的作用，于一月中动员了全国的示威者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多起抗议行动纷纷在罢工的前后于各地爆发，包含了反抗裁员和呼吁加薪的特定部门罢工、由社运团体主导反对限缩社会政策的上街游行和文化及科学部门对裁员威胁和实施的抗议等等。数十万名女性也在3月8号上街游行，反对 Milei 的经济计画和性别政策的废除。

裴隆主义作为主要的政治对手，不仅选输了上次的选举，更被社会大众视为当前危机的主要责任方，面对它们的无力，这些来自街头的反抗象征了社会反对政府的新趋势。到目前为止，尽管这些抗争有成功为 Milei 的政策设下阻碍，却仍未完全地使其停下。司法部门阻止了部分的 DNU，尤其是劳工相关的章节，而综合法案的第一版本也因为总统拒绝与希望对话的反对派进行协商而没有顺利在国会通过。然而，社会的购买力仍持续下降着；政府仍掌握了主动权，每周持续宣布新的裁员消息和废除人民权利的政策。

就在 Milei 政府上任后不久，社会的抗争便开始出现，抗议行动佔领了各个公共空间。相较之下，政府在上任之后，并未动员任何相关的支持行动。尽管它不是一个诉诸社会运动的极右翼，然而根据阿根廷过去的抗争经验，尤其是考虑到受影响群体的广泛性和多样性，现下的抗争规模还不是最严重的状态，不同形式的抗争也尚未形成统一阵线。

> 近期的抗争：特征、挑战和趋势

尽管推动抗议行为的不满非常强烈，当前的政治现况似乎使这些抗争难以持续进行下去，尤其是当反动政府视特定对象为敌人，并拒绝任何的对话。政府以限缩工会自身代表能力等方式削弱他们的组织力量，并限制他们可以参与的抗争形式，接着又降低政府对这些抗议行为的接受程度并积极的推行相对应的抵制政策。与此同时，政府用以自身的话语权和传播工具，将这些工会团体描绘成社会当前危机和动盪的肇事者。又因过去作为许多组织典型范本的裴隆主义在本次选举中的失利，导致现今的抗争难以建立起一个好的政治参照点；前进步政府的失败和当前各式改革齐一迅速的发生在当前悲愤的氛围中又添加了一丝疑虑。最后，因为新的政府上任不久，许多政策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并且仍受到半数人民的支持，这使得不满情绪难以在当前仍部分支持 Milei 政策的主流社会氛围下被成功扩散。

现在，抗争的动态仍不明确，并且未来也充满了挑战。一方面来说，政府的命运取决于它透过降低通货膨胀来稳定经济现况的能力，和建立愿意接受其领导并给予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多数。然而，除非抗争的主要行动者被严重的打压或大幅度的削弱，否则单纯的降低通货膨胀，无法解决社会倒退和由其引发的工人的力量重组问题，更不用说减缓通膨本身就是一件难以达成的事。如果目前的抗争真的被完全压制了，我们将进入到的一个冲突更不连续、断裂、无机的状态，使得我们无法清晰的看见未来变革的走向。另一方面，来自街头和机构部门中的愤恨情绪有能力去创造一股社会力量来挑战政府的行动，并以此制造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紧张情绪。不能被排除的是，如同阿根廷历史中的其他事件，这场抗争改变了当前的政治机会结构，并成功创造了新的局面。■

来信寄至：

Julián Rebón <jrebon@sociales.uba.ar>

> Ayotzinapa: 十年来有罪不罚

Carlos de Jesús Gómez-Abarca, Universidad de Ciencias y Artes de Chiapas, 墨西哥



「你们活捉他们，现在我们也要他们活着回来！」
出处：Jesús Gómez-Abarca, 2014.

2014年3月6日，在墨西哥城市中心，[人权行动者和 2014 年失踪的Ayotzinapa学生家长暴力闯入国家宫](#)。一辆箱型车撞倒了一扇具有十九世纪历史意义的大门，这一震撼人心的画面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抗议者前往游客登记处，负责守备的军方在那里施放了催泪瓦斯。与此同时，López Obrador 总统一如往常地召开晨会。宫殿窗户上的标语写着：「我们只想要对话」。有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场悲剧发生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Iguala 之夜」悲剧发生的十年后，情况有什么转变？

> 真相与调查

2014年9月26日晚上到隔天凌晨，在Guerrero州 Ayotzinapa 的「Isidro Burgos」乡村师范学院中，一群学生遭到袭击。在这次事件中，有六人遭到杀害，另有四十三名学生遭到绑架。此类事件在该地区并不少见，因为该地区长期有民众械斗和政府镇压的事件发生。青年学生遭到袭击与政府的政策有关，这些政策对乡村学校具有负面影响，因为这些学校同时与墨西哥社会主义农民学生联合会（FECSM）以及农民和学生起义的过往历史有关。

而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个危险的、涉及众多合法和非法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地区。

在 Enrique Peña Nieto 执政期间（2012到2018年），墨西哥司法部长 Jesús Murillo Karam 负责调查四十三名 Ayotzinapa 学生的「失踪」事件。2014年11月7日，Murillo 宣布了事实的「历史真相」。根据他的说法，一群被拘留者承认杀害了这些学生。这些学生前往市长夫人的活动进行破坏，因而被 Guerrero州 Iguala市的警察拘留，并被带往当地警察局。这样的「历史真相」显示，犯罪集团「Guerreros Unidos」夥同当地警方，在 Cocula 垃圾掩埋场火化了这些学生。

自 2014 年以来，家长、抗议者、对事件进行分析的人和媒体都对这一说法充满质疑，他们所提供的证词和证据表明，军方领导人知情并参与了这些犯罪行为。

2018 年，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AMLO) 就任墨西哥总统后，重启了这项调查工作，并成立了 Ayotzinapa 案件真相和司法救助委员会（COVAJ）。为了澄清事实，保障了解真

>>

相、伸张正义和不再重犯这些严重罪行的权利，委员会决定重启调查。在[该委员会的第二次报告](#)中，过往「历史真相」被推翻，这次报告对事件提出了新的假设，并承认 Ayotzinapa 案件是一起「国家犯罪」，墨西哥当局和海陆军队中，都有相关人士参与其中。

据估计，至少有四百三十四人参与了这场悲剧。三名学生的遗体已被确认，检察官已下令逮捕一百三十二人，但失踪学生至今生死未卜。被逮捕的人包含军队成员、Guerreros Unidos、警察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前官员。在过去的一年中，也有一些重要人物遭到逮捕，其中包括一些高阶官员，如前司法部长 Jesús Murillo Karam，他是发明「历史真相」的幕后黑手之一。

> 为正义而战

2014 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纪念 1968 年 10 月 2 日学生遇害游行当中，人们对四十三名 Ayotzinapa 学生的下落知之甚少。然而，这个纪念活动发展成要求让那些「失踪」的人活着回来的陈抗行动。当时墨西哥城历史中心的街道被封锁，学生、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从 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 游行到 Zócalo，表达他们的痛苦、悲伤、不信任以及对国内暴力升级的愤慨。

在随后的几个月，墨西哥各地和国外的大规模游行和集会成倍地增加。四十三名学生的家长、人权行动者、社会组织 and 公民参加了一系列的大型游行，要求伸张正义并谴责「是国家干的！」。在示威活动结束时，警民间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日益加剧。官方给的资讯很少，但民众开始对事件发展出自己的理解，并借由「既非四十三也非六十

八」等口号来表达愤怒，反对持续的镇压和政府的说词。

尽管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之后参加游行的人数有所减少，但家长们的抗争并未减弱。他们继续寻求支持，并努力与学生、民间组织和其他社会运动进行协调。近期在四十三名学生家长的带领下，他们于 2024 年 3 月闯入国家宫，试图与总统重启对话并推进调查。

这个行动发生的背景是，学生家长与 AMLO 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在 COVAJ 初期推动厘清事件最重要的人物已不再参与相关行动。在民众方面，四十三名学生的家长指出政府缺乏厘清案件的意愿，谴责政府对涉案军人的保护，并要求公开可能是调查关键的军事间谍文件，但迄今为止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政府方面，在 AMLO 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政府持续诋毁质疑者的要求，为他们贴上「保守派」的标签，并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与学生家长会面。

对 Centro Prodh 执行长 Santiago Aguirre 来说，[这起案件本可以成为新政府执政后墨西哥司法工作出现转机的典范。然而，它却成了本届政府最令人失望的作为之一](#)，这次事件暴露了新政府的军方权力以及在面对司法部长疏失时的无所作为。与此同时，属于四十三名学生的正义尚悬而未决，很可能会由下届政府来承担。在仅得到「一半真相」的情况下，四十三名学生的家长将持续不懈地寻求真相和正义。■

来信寄至：

Carlos de Jesús Gómez-Abarca
<jesus.gomezabarca@gmail.com>

> 人口剩馀与错置，难民与移民

Nadia Bou Ali 與 Ray Brassier, BICAR (Beirut Institute for Critic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



Arbu 使用 IA 创作的艺术作品

本文旨在说明「剩馀人口 (surplus population)」这个概念作为失业人口的主要特征。包括在正式劳资关系以外的不稳定就业群众，以及因资本主义贫穷化 (capitalist immiseration) 而只能被归纳在一般人口类别 (如：难民、移民) 底下的群众。难民、移民仅是抽象的描述性类别，我们需要对全球资本主义在不同动态中的「剩馀人口」进行更具体的分析。

资本主义的原始构成形式就是不均匀的：原始积累之所以原始，正因为它会随着创造剩馀价值的过程被再生产出来。尽管如此，殖民冲动 (colonial impulse) 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它既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生态系。一方面，「资本世 (capitalocene)」的特征是**对人类生命和自然的消耗**；另一方面，「人口剥夺 (demographic dispossession)」这个概念范畴描述大众如何经历这种不平等，而很重要的一点却也相当普遍的是，将他们从正式劳资关系中排除是生产剩馀价值的重要元素。

> 剩馀人口是无产阶级化

首先，要厘清一个重要的误解。根据定义，剩馀人口并不代表他们流离失所：他们不一定是来自特定国家边界之外的人口。他们不仅仅是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更是资本累积过程中成为原因的结果。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粗糙的理论提出尖锐批评。马尔萨斯将人口过剩视为自然的定律，从而证明为了其他人口的生存而牺牲某些人口是合理的。现今，有些人试图使国界免疫于剩馀人口的入侵，也有人在寻求消灭或转移可消耗人口，而大量引述马尔萨斯的理论。同时，自然环境的崩坏使人口过剩变得更加复杂，这将在后面有关资本主义生态系的讨论中一并着墨。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产生剩馀人口的不是马尔萨斯的供需逻辑，而是价值化逻辑 (valorization)，或者说剩馀价值最大化的逻辑：

「正是资本累积本身不断生产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而且是与资本自身的能力与限度直接相关的，意即，相对于资本自身增值的平均需求来说

>>

是多餘的人口，故称为『剩餘人口』 [...]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法则；事实上，每种历史上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人口规律，也都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具有解释力。」《资本论》

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是：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相对过剩。「劳动供需法则」控制了一般工资（工人阶级的，即劳动力）与社会资本总额的比率：「劳动的生产力越高，工人就业的压力就越大，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就越不稳定」（《资本论》，斜体为本文强调）。同时，「机器生产制造出过剩的劳动人口」《资本论》。在此脉络下，是「工资－资本」比率关系本身导致工人阶级的贫穷化和无产阶级化。

这表示，借着「工资－资本」比率关系，相对过剩人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和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尽管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机械化、自动化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也发展了劳动力；情况似乎恰恰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下降，薪资也下降。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提高剥削率（从劳动力中榨取剩餘价值的比率），从而提高剩餘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率。这不仅发生在劳动过程中，也在整体受雇的劳动群体中。从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中榨取越来越多的剩餘价值，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受雇劳动者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变得多餘。

资本造成失业，这是其真正吸收劳动过程（即重构以最大化剥削率）的条件。因此，失业者，所谓过多的或剩餘的，是现行剥削体制的基础。虽然资本透过剥削劳动力来再生产自己，劳动力也透过允许自己被资本剥削来再生产自己，但资本的价值扩张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价值的扩张；相反地，资本扩张性的自我增值导致了劳动力的贬值，也就是说，剩餘劳动力跟必要劳动力、失业人员跟就业人员的比率不断增加。换句话说，资本先将劳动跟生产工具分离，然后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他们被迫自我再生产。这种次级附属分离（就业与失业）发生在初级分离（生产者与生产工具）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剩餘劳动力与必要劳动力、失业人口与就业人员重新连结：

「[……] 无产阶级的定义是它与再生产工具的分离，并在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它被迫再生产自己。透过价值法则的「正常」运作，无产阶级的再生产（其劳动力的价值）与资本的再生产保持一致。价值法则指的是，如果工资上涨得太高，资本就会雇用更少的工人，从而创造施加压力让工资降低的后备军。重点是，只要就业者和失业

者不合力，工资终究会因为资本累积的需求而回到法则上。」（B.R.汉森）

因此，过剩人口作为「失业者的后备军」和失业的「流氓无产阶级」，既处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内部，即世界上那些已被资本完全融合或吞并的地区内部，又处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外围。也就是说，资本再生产中产生的剩餘人口既占据核心，也占据边垂：它既在中心，也在边缘。

> 看得见的群众和看不见的劳动力

剩餘人口往往以群众的形式出现。从巴黎到南美洲、中东和南亚，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贫民窟和难民营突然爆发大规模示威，甚至可称之为难民起义。这些显着的、自发性的群众起义具体呈现了往往不可见的结构动态。但它们凸显了对客观结构的主体抗争：这是从被忽视到被看见的主观时刻。

结构分析应该去揭示这些为不可见的、客观的结构所进行的可见的、主观的抗争行动。分析的第一步是区分流离失所人口和剩餘人口。尽管大量人口以难民和移民的身份出现在国界，但他们并不是唯一可以被定义为剩餘人口的群体。这种普遍误解的原因可能是意识形态上的：毫无疑问，从人权角度解决过剩人口问题更容易，方法是在已开发国家寻求融入外国人和侨民并提供庇护权的措施。然而，我认为这种观点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务上都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

剩餘人口不一定是流离失所或流动的人口。正如Aaron Benanav指出，自1950年代以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ICs）的大部分的都市失业人口实际上是在都是出生的：「早在1950年代，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ICs）都市的人口成长绝大部分是因为人们出生在都市地区，而不是迁移至此。」Benanav认为「尽管1980年后都市化速度渐缓，但都市劳动力仍在低收入世界里快速扩张。」都市劳工并不是凭空出现或从其他地方来的；它们是随着资本主义晚期成长停滞而出现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表现。都市化的速度降低，但城市贫民人口的数量却在增长：他们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他们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继续从事非典型劳动。无产阶级化可以简单理解为「依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人口比例的上升」。无产阶级化的增加并不是由于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地区，这是发展研究领域错误的主张。相反的，由于两个主要因素，低收入国家表现出对劳动力的需求较低：（一）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导致经济体生产主要服务菁英阶级需求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不是更广泛人口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产

>>

品；（二）从工业化国家引进的进步技术与自动化科技。因此，低收入国家经济的资本密集度高于劳动密集度。

尽管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在过去十年中主张适应1990年代后全球劳动力市场转变以及就业率成长的必要性，但在低收入国家和其他非已开发国家却几乎没有针对其劳动力采取任何措施。作为世界主要强国，美国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避免其内部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出现日益增强的孤立主义政策。在1990年代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辩论，以及本世纪初关于如何处理非法移民的辩论中，已经预测到北半球国家无法重新分配世界经济的利益。今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我们见到在边境和难民营中拘留非法移民、建造边境墙等政策。

> 面对社会文化偏见，移工陷入无处为家的困境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情况，主要与难民与移民人口的流动有关。十九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解体，随后遭到英法两国瓜分、殖民。自那之后，随着殖民风潮开启，殖民者依自身利益分割特定地区的领土，成为了民族国家诞生过程的特点之一。1948年，由于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大量涌入，在巴勒斯坦被占领之后，有75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邻国难民。在黎巴嫩，有26至28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分布于12个难民营和42个聚集地。[根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的资料](#)，黎巴嫩现有的680万人口中，巴勒斯坦难民约佔了25万。他们佔了黎巴嫩劳动力的5.6%，而黎巴嫩的劳动力之中，甚至有一半都不是黎巴嫩人。这些巴勒斯坦人一直被排除在正规劳动力市场外，他们没有获得正规薪水的权利，并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和其他基本公民权。与其他难民一样，黎巴嫩的就业限制条例，是禁止巴勒斯坦人从事医学、工程学和法律等自由职业的，这迫使巴勒斯坦人进入以短期、低薪工作为特点，且较为不稳定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约有半数已就业的巴勒斯坦人，是从事建筑、商业或相关活动，比如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修理、家庭用品修理等；这些行业的非正规程度相当高，工作时间比平均长，多数人的收入也低于黎巴嫩的最低薪水标准。

除了巴勒斯坦人之外，自1950年代以来，叙利亚人在黎巴嫩的移民劳动力中，也佔了很大的比例。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这个数字更是急速上升。黎巴嫩目前有150万的叙利亚难民；若是加上巴勒斯坦人，就佔了大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The Invisible Cage](#)》一书中，John Chalcraft 呈现出强迫移民与强迫劳动如何交织。这些情况背后的脉络，是以强迫劳动为前提的

劳动市场，以及移工在长期居无定所与流亡中的不断轮回。

2024年，隐形劳动的困境昭然若揭：随着2019年黎巴嫩金融崩溃，资源和劳动机会日益稀缺，黎巴嫩人对叙利亚移工抱持的偏见、仇恨心理以及带有被害妄想性质的歧视越来越严重。叙利亚移工人数的骤然增加，使得反叙情结更为强烈，同时，黎巴嫩的劳动阶级，也在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中，变得更加不稳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黎巴嫩的劳动参与率为43.4%，这表示只有不到一半的劳动适龄人口，正在为报酬或利益而工作，或者正在寻找工作。

无产阶级化非但没有促成跨国、跨种族的劳动组织，反而带来了贫穷化与不稳定，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劳动阶级分裂。在黎巴嫩，劳动阶级是由黎巴嫩人、叙利亚人、非洲人和亚洲人组成，他们从事家务劳动、照护劳动以及其他形式的不稳定劳动，这些大部分都属于再生产劳动。约有90%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是从事非正规劳动的。自2020年的疫情以来，上述难民的贫穷率上升了56%。非正规、低技能劳动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迫使难民接受工时长、薪水低、缺乏法律规范、医疗保险或带薪病假等不合理的工作环境。此外，叙利亚女工还要忍受交通的不便、儿童照护资源的缺乏，以及社会文化的偏见。这样的环境又使难民更容易遭到逮捕、强制遣返和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选择正规劳动的叙利亚难民，必须在黎巴嫩雇主的资助下，或是以租赁契约为条件，才能被登记为移民。与巴勒斯坦人一样，叙利亚人的正规就业一般限于三个部门：环境、农业和建筑业，且每年需要花费200美元取得居住许可。难民则可以在其馀几个部门中寻找工作，但仍然会面临许多经济和官僚障碍，尤其是在更新居住证方面：2020年，黎巴嫩的已登记叙利亚难民中，约有70%没有居住证，这之中以15岁或以上的难民居多。这不仅很大程度地降低了他们的谋生能力，也使其行动自由受限。

> 剩餘人口管理是资本再生产的一环

我们必须将经济移民与难民劳动力分开来谈。根据 [Elisabeth Longuenesse 和 Paul Tabar 的说法](#)，黎巴嫩的劳动力中约有15%是移工，35%是叙利亚劳工。在上文中，我们强调了将剩餘人口与流离失所者或难民人口区分开来的必要性。然而，在黎巴嫩的政治经济中，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口既包括移民、也包括难民，他们的所有困境，都交织在

>>

一起。这些群体在黎巴嫩劳动人口中，面临了双重的不利——相对于资本认为必要的劳动力而言，他们是多出来的人口；而相对于由黎巴嫩人和其他民族组成的正规／非正规的劳动人口，他们又是流离失所的一群人。他们的处境，同时呈现出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叠加，也揭示了雇佣劳动人口中，整合／离散劳动的叠加。

任何没有考量到这个差异的政治分析，都会造成两个风险。一方面，我们会预设难民是「不完全移民」(incomplete migration) 的原因之一，并以为难民问题可以借由使其返回家园，或是获得正式公民身份来缓解。这样的预设也代表着，这类的问题解决办法，背后的考量，经常是由权利和社会承认层面出发。这种方法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它使我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动态背后，有着更深、更广的效应——这些可能会影响流离失所与非流离失所的劳动阶级人口——并以进一步拉开劳动阶级之中各阶层距离的方式，来制定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然而，以现实层面来看，劳动阶级的各阶层，其实是有共同的政治条件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如果不考虑移民劳动力和难民劳动力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像许多非政府组织寻求援助以应对社会、自然灾害时所做的那样，使得人们误以为当前的政治挑战，仅仅只是管理危机的额外风险。

要是忽略了这个差异，我们也就不会意识到，对剩余人口的管理，并不是为了消除人口困境的源头，而进行的外部活动：事实上，管理剩余人口本身，就是资本再生产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不仅能透过劳动力后备军与劳动力之间的增加的竞争，来降低劳动力成本，还可以将自身置于社会再生产的断裂回圈中，使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循环维持运作。除了扩大国际劳动阶级各阶层间的鸿沟之外，这种方法终究将难民视为危机管理的实验品，并利用他们作为新社会技术的基础，以更好地管理失业者、就业不足者和贫穷化的劳动阶级。

理解、肯认难民劳动的特殊性，即是将其视为一种症状——其揭示了社会分化与经济整合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连结，而这样的连结非但没有阻碍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反而使其成为可能。这也促使我们得以重新开闢对此提问的讨论空间：一个以灾难为食的社会体系，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构性反应？■

来信寄至：

Nadia Bou Ali <nadiabouali@gmail.com>

Ray Brassier <ray.brassier@gmail.com>

这篇文章是与 [Alameda Institute](http://AlamedaInstitute.com). 共同出版。

> 是据为己有抑或利用？ 劳资冲突的生态面向

Simon Schaupp, University of Basel, 瑞士



45

出处：Ricardo Gomez Angel, 2017.

2022年秋天，数千名瑞士建筑工人举行了罢工。产业雇主协会要求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增加到 58 小时，并提出了一个相当奇特的理由：气候变迁。目前，全球有 45% 的建案因恶劣天气而建成延宕。而气候变迁导致恶劣天气的频率和强度都大幅增长；因此，将会使得建案进度延宕的状况也随之增长。更重要的是，气温超过 24° C 会降低劳动生产力。此外，建筑业是最容易受到热浪影响的行业之一；但矛盾的是，建筑业也是温室气

体的主要污染者和制造者：单就是水泥制造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约佔全球总量的 8%。

> 将对自然的支配作为产品的成分

在我最近的著作（德文版）《[新陈代谢政治学：劳动、自然和地球的未来](#)》中，我以建筑业、其他劳动与自然环境的冲突状况为例，说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生态危机两者间的关系，可以带给

>>

我们怎样的新启示。主流环境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一致认为：环境破坏是一种人类对自然无偿「占有」的关系，从而促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这当然是事实，但「占有自然」此概念在分析上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它传达了一种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原材料仓库，其产品只是在那里被收集，或者其「生态系服务」自行流入生产的形象。然而，这样的形象与现实状况是脱节的。大自然不是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的：为了「使大自然可用」，而必须投入工作。占有的概念只是描述了自然的某些方面被想像成为私有财产的活动——然而这样的描述并无涉及任何具体的事例，它只是一个抽象概念。相反，是人类的劳动迫使自然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例如，河流不仅是水、能源和食物的来源，而且始终作为一种风险而存在——它可能淹没农点和住所，也可能阻塞交通路线。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控制它：必须疏通河流、驯养动物、剷除杂草和害虫等等。因此，「利用」自然资源，在本质上意味着对自然自主性的支配。

> 对自然环境的全面控制是一条永恒的未完之路

然而，任何努力控制都无法永久压制大自然的自主性。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河道会被侵蚀、动物会生病，杂草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生长。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工作是永无止境的。此外，利用自然资源始终必须包含合理的因素，例如：培育更高产的动植物物种、使用化石燃料加速自然的新陈代谢、对生物进行基因改造使其具有经济价值等等。然而，最终这样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只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因为它损害了本应增加其效用的物质。由经验来看，自然环境被破坏后的结果是让人们想进一步利用此结果，比方，沙尘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十世纪初，欧洲移民在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上犁耕，导致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和沙尘暴。为了保持生产力，农业得到了加强，使用了合成肥料、杀虫剂和机械化；但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肥沃土地的进一步丧失。

> 人类劳动：另一种自然资源

对大自然的利用与对劳动力的利用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一样，人类并非生来就是劳动者，而是必须不断被塑造成劳动者。在人们能够工作之前，必须先对他们进行多年的教

育，即必须让他们遵守社会习俗，这些习俗构成了分工的基本条件。此外，工人还需要接受一定的普通教育和技术培训，以便能够就业。当人精疲力竭时，需要关怀和爱护；当人生病时，必须透过医疗来恢复其劳动能力。而在工作场所，人的身体透过理性化的运用和控制变得有用。

对自然与劳动利用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类比。相反，两者必定是相互依存的。让大自然变得可利用，就能加强对人类劳动的利用，而人类劳动的利用反过来又能加强对大自然的利用。例如，奴隶制和种植园经济是相互构成的：两者结合产生的剩馀棉花，加上对化石燃料的加强利用，成为工厂制度的物质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对自然界其他部分的综合利用，新的劳动潜能被应用于此。然而，利用自然环境之自相矛盾的破坏性始终存在。

> 所有劳工政治归根究底都是环境政治

建筑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92年 François Hennebique 获得了钢筋混凝土的专利，后续几十年，他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的水泥建筑施工。钢筋混凝土使建筑公司得以削减劳动成本，因为它在几乎消灭了砌砖技工这项传统职业。现在，墙壁只需用模具浇筑即可。此外，可以用沙子代替昂贵的石材作为基本材料——混凝土的生产就是今天沙子成为地球上迄今为止开采量最大的资源的主要原因。由于只有来自河流和湖泊的沙子才能用于建筑，因此沙子的采购和生产造成了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除此之外，[建筑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是造成气候变迁的主要原因，这反过来又破坏了建筑业本身的生產力。

如果如 [Karl Marx](#) 所言，劳动始终是对自然的改造，那么所有的生产政治也都是环境政治——或「新陈代谢政治」。这表示，为了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地球环境可能的出路，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工作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对工作和自然的破坏性利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工作量集约化具有未被充分开发的生态面向看来，可以成革新的政治新陈代谢的起点。■

来信寄至：

Simon Schaupp <simon.schaupp@unibas.ch>

Twitter: [@simschaupp](#)

> 中东地区在数位层面的双重困境

Mohamed Zayani, Georgetown University, 卡达; Joe F. Khal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卡达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数位双重绑定](#)》一书部分封面

阿拉伯中东地区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数位转型，为经济成长、社会变迁和政治赋权开闢了新的途径。无论是采用数位政府、远距医疗或数位法院，数位化的蜕变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它改变了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的做法，为那些被认为不适合革新的部门注入了新的活力。成功发展的地区性新创公司包括了：计程车软体Careem、高科技城市发展计画 Neom，以及「百万阿拉伯工程师」(One Million Arab Coders) 等抱负远大的计划，都是此地区努力将数位化科技运用到生活各个层面的证明。目前，该地区许多的国家都正透过投资数位科技的基础设施（如卫星、光纤、最新一代的网路设备）来实现数位化生活，并透过制定更全面的数位计划，发起各种倡议、努力采用知识经济。

> 数位化的地区差异和潜在的紧张关系

然而，中东地区尚未全面实施数位化。地区之间呈现明显差异，某些国家全面拥抱数位转型，而其他国家落后。科技取得的不均衡和数位素养的参差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造成此地区更多重的数位落差。这些提醒我们，数位转型不仅仅是采用新技术，更是需要驾驭技术创新与社会变迁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现实状况却是与中东转型的诺言全然地背道而驰。

数位科技的进步在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中东地区全面进入数位时代的特点是，变革的冲动与阻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种矛盾使该地区陷入了[双重困境](#)数位科技

>>

的应用既促使了革新，但也维持了现有的僵局。数位化所带来的可能性，也正是许多经济参与者、社会运动者和政治体制在面对数位化双重束缚时感到忧虑的根源，这迫使他们既要利用技术能力，又要掌握好运用数位。

要把握数位应用的复杂性，我们就必须将讨论的焦点从人们如何使用技术转移到探索国家、市场和公众数位沉浸所导致的不协调和紧张关系上来。我们应该研究社会性，而不是剖析数位化。

> 现代化与抵抗之间

从历史来看，中东与科技的关系一直与其参与现代化 (al-asrara) 和努力应对现代性 (al-hadatha) 交织在一起。从殖民时代至今，此地区既接受技术革新，也抵制技术上的变革。这样的模糊关系，反映了科技应用是如何与他们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状态连结在一起。以沙乌地阿拉伯为例：沙乌地王国在 1960 年代抵制电视的引进，1990 年代对网路的广泛被使用感到忧虑，但与之相合的是，他们在电视产业方面领导在前，并推动数位媒体行业的蓬勃发展，从跨国卫星频道、发展良好的游戏工作室，到全球数位投资和本土初创企业都是他们尝试启动的新数位化计画。

一直以来，科技的应用都带来挑战。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技术依赖叙事的出现是反对西方影响和势力的一种号召；同时，这些国家也意识到，获取西方技术在他们现代化努力和发展的计画中占据相当重要位置。在当前高度工业化的时代，经济压力、快速变革和快速城市化使该地区的技术和专业知识转移，变得更加迫切。

即使科技本身不断发展，这种发展路线的吸引力也一直存在。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和数位资本主义的出现，追求现代化的重点已从传统产业的技术转移转向数位转型。在这样不断演变的背景下，采用知识经济已成为实现经济成长和社会变革的标志。

> 共同的愿望与发展的不平衡

但实际上，这些努力充其只是参差不齐。尤其是当有些国家，如：叶门、苏丹、叙利亚在资讯与传播技术 (ICT) 基础设施和数位化准备方面明显不足；而另一些国家，如：海湾国家则全心全

意地拥抱数位化，投资最新的网路设备并建立智慧城市。如：阿联酋、卡达和沙乌地阿拉伯在全球数位化和科技准备程度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他们正在成为数位化的强国，而该地区较早采用网路的国家，如：突尼西亚在数位转型方面却是较为落后的。同时，中东国家（如约旦）被公认为资讯科技 (IT) 人才丰沛但尚未发展成为地区数位 IT 中心的国家。

虽然基础设施差往往与经济指数低或和政治文化的限制性有关，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要只根据基础设施、经济或政治变数对数位化进行分类。还需加入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在内的各种因素审视，因为这些层面也都对一个国家的数位化状况和准备程度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细致的理解对于全面分析和有效制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 沉浸式的数位转型

即使克服了许多不足之处，中东地区的数位化仍陷入变革动力增长与阻力之间的矛盾拉扯之中。这就是该地区陷入的**数位化双重困境**。虽然采用和调整数位技术能推动国家、市场和公众进入一个沉浸式的数位领域，但这种努力却矛盾地也阻碍了该地区获得实质变革的动力，使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事实上，各国在拥抱数位化的同时，也是在将本国公民与网路相互隔绝。因为，它们寻求发展以创新和创造力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但同时又拒绝放弃以特权和权利为基础、只为特定客户服务的经济体系。它们既提倡创业文化，也维持等级严格、回避风险的商业文化。

然而，在这些复杂因素中，必须认识到变革与停滞并不互相排斥。中东的发展道路既有连续性，也有变革性，反映了技术进步与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动态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

来信寄至：

Mohamed Zayani

<mz92@georgetown.edu>

Joe F. Khalil

<khalil@northwestern.edu>

/ Twitter: @JoeKhalil

> 来自加萨学术界的公开信

加萨学术界*



2024年4月21日，加萨团结营地在哥伦比亚大学恢复的第四天。
出处：维基百科。

为了我们与学生、同仁们的生存和我们所坚守的未来，以及面临试图将我们所有人消灭的严峻现状，我们代表巴勒斯坦学术界和加萨众多大学的教职员发声。

虽然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势力摧毁了我们的学院建筑，但我们的大学仍然存在。我们重申我们集体的决心，坚持留在我们的土地上，并在在我们自己巴勒斯坦的大学里尽快恢复能够教学、学习和研究的机会。

我们共同呼吁全世界的朋友和同仁们，抵制在遭到占领的巴勒斯坦里正在进行的学术屠杀。并且与我们一起重建遭到摧毁的大学。拒绝所有试图绕过、消灭或削弱我们学术机构完整性的计划。加萨年轻人的未来仰赖着我们，仰赖着我们能够留在我们的土地上，继续为我们下一代的人民服务。

我们在隆隆炮火下被占领的加萨、在Rafah的难民营、在埃及以及其他接待国家的新临时流亡地发出此一呼吁。我们发出这个呼吁是因为，以色列

占领势力每天仍将持续进行种族灭绝的行动，试图消灭我们在集体和个人生活的每一层面。

我们的家人、同仁和学生遭到暗杀，而我们正再次被迫流离失所，重新经历我们父辈母辈在1947年和1948年锡安主义武装部队大屠杀和大驱离行动中的经历。

我们的公共设施——大学、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中心——是我们几代人一手打造的，现在因为这场蓄意且持续为之的大灾难（Nakba）而成为废墟。蓄意针对我们的教育基础设施进行攻击，明显是试图让加萨变成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侵蚀我们社会的知识和文化架构。不过，我们决不让这些行动浇熄我们内心熊熊燃烧的智识和坚毅之火。

在美国和英国，支持以色列占领的盟友正在透过推动所谓的重建计划，开闢另一个学术屠杀的战线。这个计画旨在剥夺在加萨进行独立巴勒斯坦教育的可能。我们抵制所有相关的计划，并敦促我们

的同仁拒绝参与其中的任何合作。我们还呼吁全世界所有的大学和同仁们直接与我们大学协调其所欲提供的任何学术援助。

我们由衷感谢那些在艰困时刻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并且提供支持和援助。然而，我们重申这些协调上的努力，在促使多所在加萨的巴勒斯坦大学重新开放上至关重要。

我们再次重申重新启动加萨教育机构的迫切需要。这不仅仅是为了支持我们现有的学生，而是确保我们高等教育系统的长期韧性和可持续性。教育不仅仅是传道授业；它更是我们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基石，是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象征。

因此，制定一个长期战略来恢复基础设施并重建大学尤为重要。然而，这些努力需要大量时间和可观的资金，这可能对维持学术机构的运营造成风险，渐渐流失教职员和学生，以及重新运营的能力。

有鑑于此，将大学教育迅速过渡到线上教学，以减轻基础设施被摧毁伴随而来的教学中断是极为重要的。这样的工程则涵盖运营成本、学术人员薪资等人力与资金上的全面性支持。

另外，学费是大学主要的收入来源，但自从这场种族灭绝行动开始，这一收入已然不可行。大学缺乏收入无法支付教职员工薪水，进一步迫使许多人寻找其他工作机会。

除了对大学教职员生计的打击外，这种蓄意的学术屠杀行动亦造成大学财政压力，并威胁了大学自身的生存。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学术机构目前所面临的财政危机，确保其得以生存。我们呼吁所有有关方能够立即协调各自资源，支持这一至关重要的目标。

重建加萨的学术机构不仅仅是一个教育上的问题；它是我们毅力、决心和不懈承诺的象征，是确保后代未来的重要证明。

加萨高等教育命运属于加萨的大学、其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整个巴勒斯坦人民。我们感谢全球各地人民和公民致力终结这场持续不断的种族灭绝。

我们呼吁国内外的同仁们支持我们坚定不移的努力，捍卫和保有我们的大学，为了我们人民的未来，以及我们留在加萨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能力。我们曾于帐篷中建立了这些大学。有了各方友人的支持，我们将在帐篷下再次重建。■

*这封信由来自加萨的185名学者签署。

完整的签署人名单请见：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4/5/29/open-letter-by-gaza-academics-and-university-administrators-to-the-world>

